

論工商業政策

中國共產黨政策選輯之一
(標準本)

華書書店印行

總發行所
圖書



116
F271.296
168



中國共產黨政策選輯之一

論
工
商
業
政
策

(標準本)

新華書店出版

~~30693~~

版字 30693

目錄

一、論工商業政策	毛澤東
二、對工商業的政策	任弼時
三、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	陳伯達
四、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公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	東北日報
五、保護國家財產、保護公共財產	陳伯達
六、「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東北日報
七、中共東北鐵路黨委會關於實行乘務負責制的決定	陳伯達
八、在瀋陽工人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陳雲
九、中國人民銀行冀魯豫分行在城市業務中的錯誤	新華社
十、臨清事件與國營商業	新華社
十一、企業管理民主化是改進生產重要的保證	東北日報
十二、不要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	陳伯達
附錄一、企業管理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改變	
二、臨清事件經過	

論工商業政策

——（摘自毛澤東：『目前

形勢與我們的任務』）——



— 1 —

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爲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鉅大資本，壟斷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的結合着，成爲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及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峯，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這個資本，在中國通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新

民主主義的革命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被這些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所壓迫與損害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雖然也是資產階級，卻是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們和帝國主義沒有聯系，或者聯系較少，他們是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到達的地方，對於這些階級，必須堅決的毫不猶豫的給以保護。蔣介石統治區域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其中有為數不多的一部份人，即這些階級的右翼份子，存在着反動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集團散佈幻想，他們反對人民民主革命。當着他們的反動傾向尚能影響羣衆時，我們應當向着接受他們影響的羣衆進行揭露工作，打擊他們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使羣衆從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但是，政治上的打擊與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如果混同這兩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新民主主義革命主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的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裏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是指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小規模的工商業資本家。此外還有不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廣大的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對於這些小工商業者，不待說是應當堅決保護的。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由於新民主主義國家手裏有着從官僚資產階級接收過來的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巨大的國家資本，又有從封建制度解放出來，雖則在一個頗長時間內在本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個體的，但是在將來可以逐步的引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在這些條件下，這些小的及中等的資本主義

份，其存在及發展，並沒有甚麼危險。對於土地革命後農村中必然發生的新的富農經濟，也是如此。對於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份採取過左的錯誤政策，如像我們黨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是絕對不許重複的。這種錯誤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勞動羣衆的利益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中國土地法大綱上有一條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這裏所說的工商業者，就是指的一切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及一切小的與中等的資本主義成份。總起來說，新中國的構成是：（1）國家經濟，這是領導的成份；（2）由個體逐步地向着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及小的與中等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的追隨着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對工商業的政策

——（摘自任弼時：『土地

改革中幾個問題』）——

對工商業不要採取冒險政策。各地已發生有破壞工商業的現象。例如陝北神木地區的高家堡當被我軍收復時，連小商販也沒收了。這是一種自殺政策。中國土地法大綱上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一般工商業是應當受到保護的，就是地主富農所經營的工商業，也不應當沒收，同樣是應當受到民主政府的保護。不要以為這些工商業是地主富農所投資而加以歧視，這是不對的，應當看到這些工商業的存在，有益於今天的社會經濟。黨的政策是僅僅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大惡霸反革命份子的工商業歸國家或人民所有，並且確定這些應當沒收的工商業，凡是為國民經濟所需要者，必須使之能夠繼續營業，不得停閉，更不得破壞和任意分散。這些政策不僅適用於原有解放區，也適用於將來解放的新區域。你們不久就要打出去，必須嚴格遵守這種政策，絕對不能重複如陳高家堡一類的錯誤。那麼地主在過去減租減息時期將土地

變賣而投資工商業者，現在是否可以沒收呢？不可以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是保護和鼓勵這些工商業，因為這樣對於繁榮中國的經濟是有利的，是需要的。在鬥地主地財時，必須規定不許地主破壞已有的工商業，否則要受處罰。

毛主席說：「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之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份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我們要把毛主席這篇道理，向工人農民和士兵羣衆解釋清楚，使他們懂得爲何要有工商業，教育一切勞動人民懂得局部的暫時的利益，要服從整個的長遠的利益。譬如地主開座煤窖，農民從目前局部利益出發，是可以舉手擁護沒收分配的，因爲將煤窖的工具和物資大家分到一份可以暫時解決自己的問題。如果我們批准這樣做，形式上看來是走羣衆路線，實質上是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說服農民懂得煤窖完整存在的利益，分散了就是把煤窖弄垮，結果自己也會無煤燒，這就妨礙了解放區的經濟發展。

我們說解放區經濟要獨立自主，我們不能作殖民地的殖民地。只有經濟上不依靠別人，軍事上政治上才有力量。我們要經濟上能獨立自主，就要使公營的，私營的，人民合作經營的手工業、工業，以及農村的農業都有一個發展；生產人民與軍隊大量的必須品和糧食，使我們對外貿易能保持平衡，以至出超，不去買蔣區的貨物和美國貨。

有了工業農業生產品，就須要有商業，例如公私商店、消費合作社等作爲橋樑，使生產者能賣出他們所生產的商品，使消費者能夠得到這些商品，經過這樣的流轉，才能使工業進行再生產與擴大的再生產。現在解放區內政府的貿易公司還沒有力量開設商店（現在許多機關部隊所設的公營商店，往往爲着解決本單位困難，沒有負起應有的任務，甚至有違反政策的現象發生），

合作社也發展的不普遍而且往往辦得不好。因此，私商的存在是需要的。商人當然有剝削；商人的商業行爲本身不生產任何價值，他們或者是分享資本家一部份利潤，或者是直接對生產者消費者實行剝削。有時囤積居奇，作投機事業，爲害更大。但問題不是要去破壞商業，而是要去領導商業。要能掌握整個商業的發展，要商人爲我所用，而不要我們爲商人所用。這種政策對於人民固然是有利的，對於正當商人也是有利的。至於小商小販，大部份是貧苦的，他們的生活只相當於貧農中農或富裕中農，更不應該去打擊他們，如在陝北高家堡所發生的破壞商業的情形，是絕對錯誤的；那裏的商業搞垮了，老百姓買東西就要到榆林、神木或鎮川堡，那就很不方便。因此，我們對工商業，應採保護和領導的政策，絕對不能破壞，破壞是一種自殺政策。對工商業必須收稅，但必須訂出恰當的稅率，不要收得太重。這種稅率，以不致影響他們的經營與發展爲原則。否則，就會犯錯誤。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

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

陳伯達

各解放區製造工具的工業和製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之增加與供不應求，說明了農民解放後中國新工業迅速發展的無限前途，而工業生產力的偉大標誌，更特別表現在工人對於生產的新的積極性。

在解放了的地方，一方面，是工人的勞動態度發生了從所未有的變化。工人們的口號，叫做「建立新的勞動態度」。建立新的勞動態度，這是解放區工人階級新的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下推動生產力前進的最主要的動力。有一個城市的鐵路工人代表會，已把建立新的勞動態度列為工會的工作綱領之一。根據一些公營工廠的資料，工人們在日寇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採取「磨洋工」的態度，去對付日寇和國民黨的壓迫，有時一次大小便，也可以拖它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吃飯慢吞吞，但現在工人們說，可不能再末「磨洋工」了，現在是給人民自己幹活了。過去上工的笛聲響了之後，工人們還要這樣那樣拖點上工的時間，現在一聽到笛聲，

就趕着上工了。過去爲了生活而偷盜材料，或在工作中缺乏責任心而浪費材料，乃是通常的現象，現在工人們對這種情況，已有根本的改變，如有個別偷盜的，工人們就自動去追回來。所有這些，乃是目前解放區工業生產力發展最積極的因素。一個剛解放不久的城市，那裏鐵路工人修路的情況可說是提高生產效率的一種典型。原來一根鐵軌要八個人抬，現在有時有人去喝水，六個人也抬着走，甚至剩下四個人也一標抬着走。過去捎夾板是一個人每次擱兩塊，現在最高紀錄竟擱到十二塊，平均是擱八塊。過去抬枕木，平均兩個人一塊，現在平均一個人一塊，最高紀錄是一個人三塊。過去修路，二百人一天修六百米，現在平均一天修一千五百米，最高達到三千零五十米，超過過去歷史上的一切紀錄。鐵路附設的鑄工廠，同樣是這種情況：過去鋸枕木一天一班十二三人出五六十塊，現在最高可達到一百五十塊，平均可保持一百三四十塊；螺絲過去一個架出四五十條，現在可出七八十條。有一個紗廠，過去工作十二小時，生產〇·四八至〇·五一磅紗，現在工作八小時，也將達到〇·四至〇·四五磅。有一個鑄工廠，現在十小時的工作，比過去十二小時的工作還強。諸如此類，不能一一列舉，這是工人們政治覺悟空前提高的表現。用一切方法鞏固並繼續提高工人們的這種政治覺悟，將是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最可靠的保障。不僅是這類公營工廠是這樣；在私人資本的企業中，勞資關係處理得正確，那裏工人們的勞動態度，也同樣起了新的變化，經常有提高生產效率的新鮮事實出現。

另一方面，自由資產階級則驚羨農民解放後市場的廣闊，他們怕的是貨出不來，不怕買賣不出去，因而對於工業經營激起了極大的興趣和熱忱。許多鐵工業的資本家，都在計劃如何擴大自己的生產事業，只因爲材料不夠供給生產工具的生產而着急。一個解放不久的城市，私人棉織業即由二十多家發展到一百多家，而過去在蔣介石匪幫統治下，却由日寇佔領時代的五十家減到二十多家。自由資產階級在解放區找到了發展工業的真正出路。

目前解放區繼土地改革而已經開端的工業高潮，以及工業生產效率在各種程度上的提高，這是工業生產力向上第一步的變化，這種工業生產力向上的變化，正如土地改革後農業生產力向上的變化一樣，說明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及其必然勝利，而封建買辦與官僚資本的經濟制度，則極端腐朽及其必然死亡。

二

中國共產黨的工業政策，是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共產黨經濟政策的一切方面，是從保護生產和發展生產出發。離開發展生產這一個出發點的政策，便將是錯誤的政策。在土地改革中，共產黨堅定地保護工商業，在總工運動中，共產黨解除殘留在工人身上的封建性的壓迫和束縛以後，堅定地反對過份提高工資及破壞生產的「左」傾冒險主義；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並努力對於工業發展的貸款和貨物流通等給予便利的條件。爲着使得工業能夠不斷獲得原料而擴大生產，對於煤鐵及其他礦物的擴大採掘，也已成爲我們黨和民主政府需要重視的任務。

在消滅封建土地制度和消滅官僚資本而爲中國工業發展建立最廣大的前提，並對民族工業實行堅定的保護政策之後，對於發展工業的政策有根本意義的，概括說來，是兩個政策：一個是勞動政策，另一個是稅收政策。

第一、是關於勞動政策，這個政策主要的問題，是工資問題與工會問題。

在工資問題上，過去某些老解放區有過這樣錯誤的情況，即脫離那裏社會的一般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忽視工廠的具體條件，因而提出過高的勞動條件，過份的提高工資，使得工人們過着

特別優裕的生活，同時也就使得該項工廠因爲生產成本太貴，生產品不容易賣出，而該項工廠要擴大生產當然也就成爲不可能，有的工廠甚至因此不能以廠養廠，而在有些公營工廠（指普通工業的公營工廠）中竟至需要政府的很多財政補充，才可能使該工廠繼續開工下去。若干擁護這種辦法的同志，覺得這樣就是「保護工人利益」。這種想法或這種辦法之所以錯誤，就是因爲其結果不但不能夠發展工業，並且不可免地使初生的或幼稚的工業陷於萎縮，或使工廠得到關門的結果。這是工人運動中一種自殺的政策。同時，這種勉強人爲的、無原則的、盲目的、即不合理的過份提高工資的方法，也不能夠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不能夠鼓勵他們對生產與節約的勞力；並且會使得有些工人們起了一種錯誤的想法，使他們走上庸俗的經濟主義的道路，使他們覺得可以有生活的特權，而這也就會使得工人們與其他的社會勞動人們，特別是與農民們之間，發生生活上的互相歧視與磨擦。所以，這樣並不就是保護工人利益，相反，這是在根本上違反着工人階級利益的。所以這種政策我們決不能採取。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反對上述的錯誤偏向之後，也可能發生出或已發生出另一種偏向，即忽視工資問題的正確處理能夠大踏步地推進生產力向前發展，而不問生產效率是否增進，卻一律把工資限定在最初的低水平線上，對於特別努力提高生產和減低成本的工作人員，沒有適當的獎勵，對於忘工和浪費材料或貪污舞弊的工作人員，沒有適當的處分等等。很明白：這種政策，也將損壞工人和職員們的生產積極性。還有很錯誤的，即主張技術人員與普通工人的所謂「生活平等」，而對於技術人員和職員的薪水壓得過低，這當然也會損壞技術人員的生產積極性，並同樣的會反轉而影響到損壞工人們追求進步的生產積極性。當然，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中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是中國革命領導者的階級，他們是能夠接受正確的政治動員，而加緊自己的生產積極性的，很多新解放了的地方，那裏工人們——特別是公營工廠的工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首先是受到政治解放的鼓舞而提高起來的。但

是，這種積極性，如果沒有經常合理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來加以鞏固，只靠靠政治的鼓舞，是不能繼續提高，甚至不能經常保持的。因此，必須有正確的經常能刺激工人職員生產積極性的工資政策。正確的工資政策，應該是根據當地當時的一般生活條件，以解放前的舊工資為基礎，加以合理的與適當的調整，並在這個基礎上，實行按件、按等、按分、按節約（減低生產成本）……等類的合理的與適當的累進工資制度，以及按勞分紅等類的累進獎勵制度。這種制度，須根據各種工業部門的具體情況，各個工廠的具體條件，由廠長負責，與工廠管理委員會及工資評定委員會商量，與工人代表及工人羣衆商量，吸收本廠的與別廠的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決定或採用選擇辦法，或採用那樣辦法，或對於兩樣幾樣的辦法都交錯地靈活變通採用，並由廠方與工人締結生產計劃與工資條件或獎勵辦法的具體協定，而工作的考察則都要把生產的數量與質量並重。在各工廠之間的工時與工資，應互相協議，一律達到合理的規定，但應根據各廠的具體情況，容許若干差別，不可能完全一律平等。總之，一切以對於經常能提高生產有利作為決定的先決條件。對於技師和職員的薪水，同樣需要採用這類似的制度，在保持實際的舊薪水的基礎上，根據他們工作的新勞績，節約（減低生產成本），或新創造，而按等累進。毫無疑問，根據新舊的經驗，建立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將廣大鼓舞工人們與職員們的生產熱忱，嚴肅職工的勞動紀律，改善工廠的勞動組織，提高生產品的數量與質量，杜絕浪費，監視偷盜與貪污舞弊，減少各種不生產的消耗，並不斷提高工人們與職員們的技能，使技術落後的趕上先進的，而先進的又求更新的進步。這是推動生產力前進極重要的制度。這是鞏固和發揮工人們與職員們新的勞動態度的物質基礎。實行這種制度，使工廠的生產效率可能增加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以至比這更高，這樣，工廠的工資支出雖然比前增加，可是生產收入的增加卻比工資的增加要大的很多，以至前途是難於計量。有些同志不善於作這種發展生產的企業計算，受陳舊的八股式工作所束縛，看不

見生產力發展的前途，害怕在公營工廠中建立這樣的制度。這是完全錯誤的。有的同志覺得實行這種制度會鼓勵工人們的「僱傭觀念」，這也是很錯誤的。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還讓自由資本主義發展，而不是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社會，要消滅工人們的僱傭觀念是不可能的，在實際上這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反動的幻想，在按件工資等類制度下，工人們因為進行更多的生產而得到更多的報酬——或者說是因為求得更多的報酬而進行更多的生產——的「僱傭觀念」，並沒有害處，而且是合理的，進步的。工人們取得更多的報酬，是由於出了更多的勞力與能力，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前進，另一方面，可能以更多的、生產成本更低的、即比較廉價的工業品供給農民，這樣，也就能够被農民和一切的社會勞動分子認為合理，並也就可以更加強工人和農民及一切社會勞動份子之間的團結。誠然，實行這種工資制度，是有困難的，因為這種制度需要精確的監督、檢查與計算。但是，這種困難，是容易經過羣衆的評定來克服的，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必須建立在可能的與羣衆自願的基礎上。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既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利益，也代表工人羣衆的個人和全體的利益，所以，就容易激起並將經常保持工人羣衆生產與節約的競賽的自覺熱潮，並容易由羣衆自己來建立一種羣衆互相監察、互相檢查、互相評定的制度：使那些積極工作、善於節約、愛護公物的工人、技師和職員，獲得應有的獎勵，而使那些怠工、浪費物資、偷盜、貪污、舞弊的人受到應有的處罰。

這種刺激生產的工資制度與獎勵制度，在私人資本的工廠中，已有很多採用的，積了不少的經驗，在經營上獲得很多利益，今後同樣地應該鼓勵（但不得強迫）他們合理地自由採用，而公營工廠應當向他們學習已經有了的這種許多不同的合理的很有用的經驗。

關於勞動政策中的又一重要問題，即工會問題，在解放區也提出了完全新的問題。解放區的職工運動和工會工作，應該在上述工人們建立新的勞動態度的正確口號下，鼓勵工人們生產的積

種性，促進公私工廠的工人與廠方（公營工廠是廠長、經理及工廠管理委員會，私營工廠是私人資本家及經理等）共同商量締結生產計劃與工資的協定，並經常集中生產的經驗教育工人，把我們的工會變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生產的學校。同時，在各工廠創辦為工人謀福利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應當具有消費與生產的雙重性質：一方面，供給工人消費品，使工人們的工資不受或少受市場上物價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幫助工人解決家庭生產的困難，使工人得以安心工作。現在由於物價經常波動，使規定工人工資發生困難，有些工廠按每月米煤布等實物價格來規定工資，不過這是非常繁雜的，工人也要受些損失，工人合作社如能担负供給工人必需品的任務，在一定時期內不變動各種物價，即在一定數量上配給工人各種必需的實物，則可使工資在一定時期內不致變動，工人也不受損失。比較固定價格的實物配給制，是戰時比較最能保護工人利益的。這須要政府、工會與合作社的一致努力，才能很好的實行，工會與合作社就應用大力來辦到這一點。應該說，我們許多在工會工作中的同志，對於這些事情，是還不熟悉的。但一切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三

第二、關於稅收政策。

我們黨的綱領是保護工商業。但工業比起商業來，工業又是最基本的，工業生產社會的財富，而商業（指正當的商業）只是讓商品流通的職能，是在一定社會中發展生產所不可缺少的一種經濟活動，故必須保護商業，使其能夠順利地盡其一定社會的合理的職能。但商業並不生產社會的財富。曾在某一個座談會上，有些工業資本家提出工業與商業的稅收，應該有些區別，工業

稅比商業稅更覺要從輕，以便促進生產的發展。顯然，這種要求是合理的，應該成爲解放區稅收政策的原則之一。這是工商業稅的第一原則。同時，在那個座談會上，又共同同意：在工業各部門之中，對於製造生產工具及人民生活必需品之工業稅，也應該與製造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的工業稅有區別，即製造生產工具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稅比製造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的工業稅，又需要從輕。顯然，這種意見也是合理的。這是工商業稅的第二個原則。工商業稅的第三個原則，就是用單一稅去代替國民黨政時代五花八門的苛捐雜稅。這些工業稅的原則，乃是從保護工業的生產出發，從保護工業發展的正確方向出發，並保障那一切製造生產工具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有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把這些原則變成實際，會有不少複雜的問題，而我們過去對這類的經驗又很缺乏，但實際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也仍然是在善於學習。正常的工商業所得稅，在解放初期或目前的條件下，實行起來，當然還有些困難，各地方斟酌具體情況，是可以採取一些過渡的辦法的。例如，在上述的那個座談會上，我們同志曾經和那些工業資本家商量出工商稅一種過渡的辦法：即由政府稅收機關根據當地各個行業的廠號、資本、營業等等具體情況，擬出一定期間（比如半年或一年）的該業稅收數字，並和該業資本家商議此項數目是否適當，即由該業資本家共同負擔下來，然後在該同業內，由各廠以民主討論，自報公議，按能力公平分配負擔，先營業，後納稅，而在這個負擔的期間內，除交納這個數目外，不問該工廠的生產如何擴大，不再加稅。參加座談會的工業資本家，一致歡迎這種過渡的辦法，他們覺得這種辦法好辦，而更重要的，是這種過渡辦法還可促進各工廠擴大生產或改善生產技術的自由競爭，交納多少又是經過大家公議，同業之間彼此都很熟悉，很難對私作弊，可說是公私兩利。在還不能順利實行正常的工商業所得稅之前，各地實行類似這種對於發展生產有利無害的過渡的稅收辦法，是很有必要的，而在執行的初期，因爲經驗還缺乏，同時，是對於投資和經營的新鼓勵，稅收的數目是應該

以定得比較低些爲適宜。

四

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們將解放更多更大的城市，以及土地改革後工商業的發展，處理工商業的具體政策問題，已成爲我們黨日常須要注意的議事日程。經常集中經驗與羣衆意見，定出方法，修正錯誤，這就能夠保證我們正確地執行毛澤東同志的理論與政策。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公營

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

一

兩年多來，我們接收了很多大規模的現代化的企業，如鐵路、礦山、發電站、郵電，輕重工業、市政企業。當接收時，企業內的工人與職員有下列情況：

(甲)企業內有大量體力勞動的工人，也有很多腦力勞動的職員。工人與職員，同是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的僱用勞動者，但工人與各級職員在企業內的地位和社會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內勞動條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級職員的勞動條件與生活情況，接近於工人；但他們之中，許多人帶有舊知識份子那些輕視工人的意識。其中一部份管理人員，則在日寇、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指揮和壓迫制度下，是習慣於用官僚主義的方法去管理工人的。

「八·一五」前，企業內的全部高級職員和一部份中級職員，是日本人。「八·一五」後，由中國職員代替了日本人。因此，「八·一五」後的中國高級職員，在「八·一五」前都是中級職員。當我們接收時，中國中、高級職員是企業的生產及業務管理人；一部份中級職員是職位較

低的管理人，其地位接近於下級職員；其餘的中級職員，及由「八·一五」前的中級職員提升的高級職員的一部分，其社會地位相當於自由職業者，但在企業內是較高和高級職位的管理人。不論「八·一五」前或後，接收時，中、高級職員對工人及下級職員都居於管理者的地位。工人對於一般管理人員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滿；對於少數為非作惡分子，則是痛恨的。

(乙)工人與職員對國共兩黨的認識，當時都是模糊的；但其模糊程度、性質有差別。工人對國民黨，也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正統觀念；但一給民主政府工作之後，工人的情緒是積極的，恐怕我軍撤退，盼望我軍勝利；下級職員，雖然是接近工人的階層，但在企業中工人羣衆尚未發動，中、高級職員仍佔傳統重要地位時，下級職員的多數是追隨高、中級職員的。高、中級職員對國民黨政權有濃厚的盲目正統觀念，對民主政府抱冷淡、抵抗態度；一小部份職員參加了國民黨地下軍破壞活動。由於當時工人羣衆尚未發動，原有的高、中級職員仍佔企業的重要地位，因此當時許多企業內工人甚多，生產很低。

針對上述情況，我們當時的方針是首先發動工人，同時又團結改造職員。其方法是：首先使工人認清自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領導階級，是企業主人翁的一分子，過去是為日寇、國民黨資本家創造利潤而勞動，現在則為人民大眾、為自己而勞動；同時洗刷撤換了一些為非作惡、為工人痛恨的人員，並恰當的解決了工人與一部分職員之間的矛盾，因此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工人在生產中採取了負責的態度。由於工人羣衆勞動態度的改變，生產力提高，企業的進步，又由於恰當的解決了工人與一部分職員之間的矛盾，因此也達到了團結職員的目的。

今天看來，工人與原有職員在工作中的積極性，雖然有若干差別，但應該指出，職員、連同中、高級職員在內，他們的政治認識及工作積極性，兩年來有了很大進步。進步原因有二：一方面，由於企業內工人羣衆的發動和我們團結職員的政策。另一方面，由於東北戰局的我勝敵敗，

又由於國民黨政權的反動腐敗，排斥東北職員的惡劣行爲，有了充分暴露，因此打破了職員對國民黨的幻想。因此，應該指出，今天職員的情緒與一兩年前的比較，大有區別；同時，國民黨政府企業的職員經過兩年的親身體驗，也認識了國民黨政權的反動腐敗。因此，在我新接收或將接收的企業中，也具備着團結改造舊職員的有利條件。

兩年來，處理工人與職員關係問題上，個別企業會犯過右的和「左」的錯誤。右的錯誤表現在過分信賴舊職員，而重視工人不夠；因此既不能啓發工人的積極性，也難改造教育舊職員，使生產力的提高與企業的改造受到了阻礙。「左」的錯誤表現在只重視工人，輕視職員，對職員缺乏分析，不加區別的亂打擊，形成工人與職員對立，這樣就破壞了員工團結，其最後結果也必然是妨礙生產，危害企業。依據現有經驗，處理工人與職員之間的矛盾，必須根據兩點：

第一、工人是企業中基本的生產力量，但職員也是企業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爲了提高生產，改造企業，必須體力勞動的工人與腦力勞動的職員合作，並發揚兩者的勞動熱情與工作積極性。第二、必須根據日寇、國民黨統治時期企業內各種職員與工人之間的不同關係，恰如其分的給以解決。既提高工人覺悟和勞動熱忱，又團結改造職員，達到員工團結、員工互助的目的。爲此，我們對各種職員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1、職員中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是下級職員以及既不是生產業務的管理人，也不是人事的管理人。他們之中有很多一部份，雖然具有一般舊知識份子的意識，看不起工人，但他們的勞動條件與生活狀況是接近工人的。因此，對於下級職員應該團結，大體上應該和工人一樣待遇；同時應用教育的方法改變其輕視工人的錯誤認識。

2、技術人員、工程師、專門家、技師，是管理龐大複雜的近代企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員。我們對於一切技術人員包括思想上還不同意共產主義的在內，只要忠於職務，不作破壞活

動，都應給以工作，並在生活上給以必要和可能的優待，使他們發揚專長，爲人民服務。對於能與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觀念、克服困難、能努力創造的技術人員，應予鼓勵。

3、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中專門壓迫工人的特務，礦山中專以額外剝削工人爲職業的把頭（不是一般工廠中的工頭），這些人與一般職員不同，他們與工人的矛盾最深，他們是工人至爲痛恨的。在人民企業中，決不允許特務份子和把頭制度的存在，決不能讓反動把頭擔任生產領導工作，其罪大惡極而工人要求法辦者，應允許工人要求送交法庭懲辦及追償損失。

4、總務、庶務各部門的主持人員，他們之中有不少曾經仗勢凌人、剋扣工人、職員的配給薪資，並且以公濟私、貪污自肥。他們佔有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中「肥缺」的原因，常常不是由於業務技能，而是依靠特殊勢力。洗刷撤換這些爲非作惡的人，不僅是工人的要求，也合乎多數職員的願望。對於剋扣貪污爲數重大者，應由企業與職工依法追償，但洗刷、撤換這些爲非作惡的主持人員時，必須把這些部門中未曾作惡的主持人員及非主持人員、下級職員加以區別，不應一律對待。

5、生產及業務管理人員，如鐵路的站長、段長、科長、廠長、處長，礦山的坑長，礦長，工廠的科長、部長、廠長等等，這些職員是企業內的中、高級職員，並佔中、高級職員的最大部分。在日偽時期，這些職位的職員的絕大部分是日本人；「八·一五」後，由中國職員代替了日本人員；在國民黨政府企業中，當我接收時，上級職員的幾乎全體，及中級職員的一部，已被國民黨軍端走。所有這些日偽和國民黨政府企業內留下的生產業務管理人員，一方面，他們有專門或業務技能，有組織生產、組織業務的經驗，他們在生產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於他們中的多數是日寇、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企業中或大或小兼管人事的生產及業務管理人員，他們管理的性質及方式雖然不同於把頭、特務，但與工人之間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對於這些人

員的使用及他們與工人之間的矛盾的處理，必須謹慎而恰當。

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的資本主義經營方法，是在剝削壓迫的基礎上，倚靠一部分組織生產及業務的職員來管理工人，而這種管理，又不能不是官僚主義的方法，所以在生產及業務管理上所發生的工人與職員之間的矛盾，其形式上雖然是職員與工人的矛盾，但實質上是日寇、官僚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在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被接收而變為人民企業時，這種矛盾已不存在。由於上述原因，對於日寇、國民黨統治時期由這種矛盾所產生的工人對管理人員的不滿，其解決辦法不應該是「流血鬥爭」或毆打職員；但忽視工人對管理人員的不滿，也是錯誤的，其結果必然阻礙工人的勞動熱忱。因此，正確的解決辦法應該是工人羣衆的批評與管理人員的自我批評、賠禮、道歉，以便最後達到團結的目的。

這些管理人員，一般雖有思想上和作風上的毛病，但他們的專門技能或業務管理知識，無論目前或將來，對經濟建設和人民企業都是需要的，我們許多共產黨員還必須用心向他們學習這些知識和技能。這些人員中，除了少數高級職員，或因本身是官僚，或因在舊社會有特殊地位，不願為人民服務，或因作惡過多為工人痛恨不能留用者外，其餘凡願為人民服務、忠於職務、不作破壞活動者，都應給以工作。其職務的分配應照顧兩個方面：一方面，必須使用其長；另一方面，如果不調離原來職務即將妨礙企業中必須的民主活動和工人的勞動熱忱時，則必須調離原職，給以其他適當工作。凡管理人員在人民企業內工作積極又與工人合作，生產業務上獲得成績者，應受獎勵。

二

一般職員，即下級職員、技術人員、生產業務管理人員，尤其是高級和中級職員，他們的勞

動態度及對工人的態度與管理方法必須改變。爲了改造他們的勞動態度，必須使職員認識：國民黨政權必亡，人民解放運動必成；國民黨政府企業變爲人民企業是企業性質的根本改變。過去是企業屬於官僚資本家，因此一切勞動者是爲少數官僚資本家創造財富；現在是企業屬於人民大眾，勞動是爲人民大眾，也爲了自己；在國民黨政府企業中，用人唯私，在人民企業中，用人唯賢；在舊社會中，科學和科學工作者毫無充分發展的機會，在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則有無限發展的前途。爲了改變職員對工人的態度，必須使職員認識：工人是企業中最大量、最重要的勞動者。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的資本主義經營方法是以皮鞭和飢餓來強迫工人爲日寇和官僚資本家創造利潤，這不但不能使工人有自願的高度生產情緒，恰恰是造成工人反抗的根本原因；在人民企業中，一切勞動者都是企業的主人翁。生產、業務管理的進行，一方面須有企業規則（即廠規、店規）；同時主要的依賴工人羣衆自覺的勞動紀律和維護勞動紀律的輿論。因此，在人民企業中，不應也不能採取官僚主義的壓迫的方法來管理，而必須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方法來管理。

對於職員的改造，是一種思想與作風的改造，是細緻而長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處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與職員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爲了這個目的，可以採用討論會、座談會、研究班、訓練班等方式。

三

爲適應經濟建設及企業發展的需要，除原有生產之業務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必須進行思想與作風的改造及培養提高外，一切經濟企業同時必需十分注意提拔優秀的工人、職員，培養成爲新的

生產、業務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

四

過去接收的日偽企業中，已有一些「八·一五」前後加入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現在新接收的企業中，有更多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國民黨、三青團在企業中曾實行大量吸收黨員、團員和集體入黨、入團的辦法，許多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的職員及工人，其入黨、入團目的是爲了保障職業；但其中確有若干國民黨員、三青團員是特務份子，過去負有監視工人、職員的職務，當企業被我接收後，即隱蔽、埋伏、從事破壞活動。因此，我們的政策對於不同情況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應加區別；對於爲保障職業而加入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應令其登記，並報告入黨經過，在保證不參加破壞活動的條件下，給以工作；但在短期內不可担任重要職務。對於負責黨務、團務的人員，則必須分清其是否特務份子而決定去留。對於隱藏的特務份子，則必須提高警惕，從企業中清除出去。

五

解決工人與職員在生產、業務管理方面舊有矛盾，改變舊的管理方法之後，在人民企業內，依然必須有人民的嚴格的管理制度與代表人民和國家的管理人員；否則，組織生產、組織業務是不可能的。管理人員中有革命多年的老幹部，有新提升的工人、職員，但其中有許多是舊的管理人員，這些舊的管理人員，當着他們忠於業務，依照企業規則執行職務上的管理時，其所屬的工人和職員，包括其所屬員工中的共產黨員在內，必須服從。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保護國家財產

保護公共財產

——東北日報社論摘要——

東北日報發表的題爲「保護國家財產，保護公共財產」的社論稱：

我們解放區現在有了大城市、大工業，也有了鐵路，我們的國家財產與公共財產是大大增加了，這是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一個巨大的歷史變化。因爲有了這一變化，所以革命戰爭才能勝利地轉入今天大規模進攻的形勢。社論繼稱：一切國家財產和公共財產，都是中國勞動人民血汗的結晶，都是國家民族的巨大財富。這些財富如果拿在反革命手裏，就成爲壓迫人民、榨取人民與支持反革命戰爭的工具；但是如果拿在革命人民手裏，就會成爲保衛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支持革命戰爭的工具了。它們對於革命戰爭就是如此的成敗攸關！

社論回溯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時期的艱苦情況稱：那時我們沒有大城市、大工業和鐵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努力下，組織農村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力量，進行長期的艱苦的游擊戰爭。那時，我們是嘗過了「無工業，無城市」的滋味，受盡了千辛萬苦的。那時我們

都會想到：如果我們一旦有了這些東西，一定要好好愛護它，使用它，依靠它來打倒反革命的統治。

社論指出，現在對於很好地保護國家財產與公共財產，可惜還有不少地方不少同志沒有很好的注意和執行。特別在新收復區，有些搜檢破銅爛鐵的人們，把完整的車床、鍋爐和發動機也「檢」走了，使本來完整的工廠反而殘缺不全；有的地方，在電氣材料特別缺乏的時候，竟允許某些工廠收買電綫鋸齒、洗臉盆，還說這是「發展工業生產」；有的地方把路軌當廢鐵，把枕木當燃料，完全沒有想到我們目前鐵路建設工作是多麼需用這些材料。在老地區，經過許多教育與鬥爭之後，上述現象是比較少多了，但仍有慢性的破壞與浪費現象。個別地方，工廠不慎失火了，價值巨大的糧食耗費了。這種對國家財產和公共財產的破壞和耗費，實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一個兇惡的敵人，對於這些現象的容忍放任、熟視無睹，無異對革命事業犯罪。

社論指出，造成這些現象的思想原因，主要的是長期在分散的、鄉村的、游擊戰爭的環境中所養成的游擊習氣、本位主義、狹隘的財政觀點，以致在處理國家財產與公共財產的時候，沒有整體觀念，沒有統一觀念，沒有計劃觀念，其結果，就不自覺地爲了本單位的局部利益，破壞了整個的利益。再來雜一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小生產者的散漫性，破壞性，自私自理與統帥子弟不專生計的揮霍習氣反映到革命隊伍中來，就更加重了這類破壞現象與浪費現象。因此，保護國家財產與公共財產，是必須通過嚴肅的思想鬥爭，才能達到目的。

聯系這一鬥爭，要加強整個財經工作中的計劃性，力求做到真正的統一與集中。如果財經經濟系統中的各自爲政的狀態不克服，那末，破壞與浪費現象還是不能完全消滅的。

同時要嚴密國家財產的保護方法與管理制度。政權機關與經濟機關必須訂出保護與管理國庫財產與公共財產的制度，頒佈反對破壞與浪費公有財產的法令，訂出嚴厲的制裁辦法。一時不能

復工的工廠和一時不能修復的房屋等等都需要專人看管，不要爲節省較小的開支而任其破壞，反使國家受到更大的損失。每個工廠，每個機關，每個學校必須將一切國家財產及公共財產加以登記，按期檢查，財產之保管與使用必須職責分明，賞罰嚴明。

聯系這一鬥爭，還必須造成大規模的、羣衆性的、保護國家財產的運動。動員羣衆，首先是工人階級去和一切破壞與浪費的現象作鬥爭。必須充分理解與發揮工人階級對生產建設事業的積極性。

最後在保護國家財產的工作中必須大大提高我們的警惕性，加強保衛、鋤奸工作，防止反革命敵探特務的陰謀破壞。

社論指出，革命人民從反革命手裏奪回自己所創造的城市、工業和鐵路，曾經付出了極巨大的代價，許多同志會因此而貢獻了自己的生命，我們現有的這些財產，不但是勞動人民血與汗的結晶，而且是革命英雄血與汗的結晶。因此保護國家財產和公共財產是每個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共產黨員、公務人員和人民解放戰士及一切民主人士的神聖的革命的責任。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陳伯達

——介紹列寧論學習經濟工作——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所寫的一個題目。毛澤東同志在那裏所寫的是關於軍事問題。從人民解放軍勝利的實際看來，我們全黨響應了毛澤東同志的號召，已經大體上學會了戰爭，雖然在這方面我們還是不能自己滿足，還需要繼續學習，要學習得更多，更好。除了在軍事這一方面應該繼續學習之外，顯然，今天我們特別要提出來學習關於經濟的工作與文化教育的工作。很久以來，毛澤東同志即號召我們學習這兩項工作，我們過去也學習過一些，做過一些工作，並且有過創造，以至是重要的創造，因此，在許多最艱苦的年月，我們渡過了許多經濟的難關，提高了羣衆政治的覺悟。這類成績，是不能磨滅的。但是，我們還應該承認：在這兩方面的工作，我們仍然是極端幼稚，有時簡直幼稚得可笑。這是不足怪的：第一，因為我們黨絕大多數的優秀幹部，二十幾年來一直爲軍事與政治工作而奔忙，精力集中在那些方面，而不是在這些方面。當然，在經濟與文化的方面，我們也有優秀的幹部，但比起軍事與政治的方面來是太少了。第二，因為我們執政的地區，過去大都是較偏僻的農村環境，大工業很微薄，商業鬥爭的問題是存在了的，但是，一般說來，經濟情況比起現在要簡

軍多了。同樣地，文化教育的情況也是比較簡單的。因此，過去的經驗是很不夠用的。而且，經驗總是兩方面的，有正確的經驗，也有錯誤的經驗，我們許多同志沒有認真去學習這種種過去的經驗，也沒有認真去領會毛澤東同志關於這種種經驗的總結，因此，在新的環境下，一方面就可能不會利用過去的正確的經驗，另一方面又可能再犯過去的錯誤。

我們共產黨員，正如斯大林的名言：「是特種式樣的人。我們是由特別材料製成的」。對於我們共產黨員，是沒有什麼不能夠學會的。絕對不是不能夠學會，而是「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只要我們能夠遵守毛澤東同志的教訓而善於學習，那末，我們也就會像在軍事戰線上的百戰百勝一樣，我們在經濟戰線上與在文化教育戰線上仍將贏得百戰百勝。

沒有任何人（連我們的敵人在內）能夠懷疑我們在軍事上將在全國勝利。我們在全國勝利，澈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這是早經確定的了。但是，全國人民不只是需要我們在軍事上有本領，而且需要我們在經濟工作上，在文化教育工作上，有同樣的本領。特別關於經濟工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上面，就嚴重地警告過我們：「我們不但應該會辦政治，會辦軍事，會辦黨務，會辦文化，我們也應該會辦經濟。如果我們那樣能幹，惟獨對於經濟無能，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歡宴職工代表會上，毛澤東同志又說：「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麼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已說了好多年，到了現在，人民是更迫切地需要我們在這些方面

的本領了。過去因為所處的條件，我們這些方面的本領雖然差些，也還沒有特別顯出迫切的危險性來；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已擁有、並且將繼續擁有大城市與工業區，我們將擁有全國，特別是大部份解放區已消滅了封建、而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即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公營企業已日有增加，並且將日益增進其在經濟上的領導作用（雖然它今天在經濟上的比重還是很弱小的），如果我們——人民首腦的共產黨員——還不去特別努力學習，真正學會經濟工作與文化教育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那末，即使我們軍事上在全國完全勝利了，我們也還可能在經濟上競爭不過別人，也還可能變成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

本年三月間。大公報刊載了一篇通訊，是一個從鞍山出來的工程師的投稿，裏面很嚴厲的批評了我們，措辭很不禮貌，其中有幾句話，說是：「……對於農村，他們（按：指我們共產黨人）是駕輕就熟，很有辦法。對於都市，尤其一個工業城市，顯然生疎得很，他們還是非常的缺乏人材，但是鞍山的共黨當局却不知道收羅人材……」。大家知道：大公報是一個親國民黨而經常敵視我們，反對我們的報紙，該稿作者也沒有摸清我們民族真正的出路，但是，我們暫且不管這些，上述的幾句話，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並不怕那反對我們的人發現了我們的弱點，也不管人家對我們的措辭禮貌不禮貌；我們所怕的，就是我們不敢正視我們自己的弱點，不肯用力去克服我們的弱點。事實上，在工業城市方面，我們固然「生疎得很」，就在農村方面，我們也不能驕傲自滿，我們也有生疎的東西；我們是有許多東西要繼續學習的，如果學習得還不够，我們在農村中也還可能犯錯誤。如毛澤東同志「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就指責了我們曾經在農村工作中犯了一些過「左」的錯誤。

在新辦事物則，或在生疎辦事物則，誰妄言「英雄老資格」，自稱「英雄」，誰就

要碰得皮破血流。這真是無情得很的。不管你過去的歷史多麼光榮，但在這裏不求長進，就成爲落伍者。

沒有什麼是可以「生而知之」與「不學而能」的，也沒有什麼是有學够的時候。向誰學習呢？我們的先生是到處可以找到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論學習的時候曾經告訴我們：「……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西。」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對於我們今天各部門的工作仍然保存了全部的價值。就是說：我們要向各種羣衆學習，向同盟者學習，以至向敵人學習。當然，毛澤東同志的意思不是要圍圍吞棗的學習，而是要批判的學習。

由於我們在經濟工作上還不善於學習，還沒有學會很多（當然是從一般來說），我們已嘗過了不少苦頭。特別是三四年來，我們革命的局面擴大了，經濟的事情更多更複雜，而我們的進步不够，甚至有的就把舊的狹小的經驗亂套一頓，我們的苦頭也就會得更多，吃虧更大。不少多財善賈的商人，利用我們小生產經濟分散的弱點，還企圖耍弄投機和操縱市場的舊把戲，並且因爲我們善良，因爲我們對這類行業還不清明強幹，他們就欺侮了我們。當然，那些躲在我們領導的公營工業或公營商業的機構內的壞人也欺侮我們老實，覺得我們只會幹政治，不會幹經濟，就把我們的老實看成傻瓜，而甚至發現過這樣的事情，即可以一手把我們的公家貨物從後門運出，另一手就把這些貨物送進前門來賣給我們，同時繼續向我們領取他的薪水。因爲我們的生疎，在工業中我們有些同志曾經做過很多荒謬絕倫的事情，不管我們領導的公營工廠有很多優越的條件，但是有些工廠却是在賠本的情況下過日子，競爭不過私人資本，以至於不但是工人，而且也使那些存心的確良善、願意幫助人民事業發展的工程師、技師或善於管理企業的職員，也要爲我們搖

頭，覺得我們在這些方面還太過於幼稚。

從客觀上說來，我們犯過的許多錯誤，在一定時候是很難避免的，甚至於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做過，開頭要做，也就可能錯誤百出。然而經常錯了不改，這就是我們所不可允許的了，我們必須努力改造我們自己。

X X X X X X X

爲了能夠充分說明毛澤東同志關於「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一個重要的方針，這裏要特別介紹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施行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時期，關於共產黨人要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許多極寶貴的語言。雖然現在我們和蘇聯是處在不同的革命性質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但是，如上所說，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已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國家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並存着，而隨着革命局面的擴大，官僚資本的企業也多落入我們之手，變成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企業，同時我們又還面對着極廣大的散漫小生產者的經濟，因此，我們正遇到有重大歷史關係的複雜的經濟問題，而列寧這些關於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語言，就好像就是對我們而說的。列寧這一切語言不只是對我們學做生意有益，而且對我們學做各項經濟工作同樣有益。

列寧說：「我懂得，共產黨員爲了學習經濟，的確是需要時間的，凡願學習此事的任何人，在起初幾年之間，都會犯嚴重的錯誤的，歷史是會寬恕他的，因爲這種事情對他是一件新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五金工人聯合會全代表大會共產黨團會譯上的報告）

列寧說歷史是會寬恕我們一些不可避免的錯誤的，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是，列寧告訴我們：不要在錯誤面前盲目起來。列寧說：

「……最主要的是，要能冷靜地會看出這種錯誤究竟是在那裏發生的，再從頭重新做起。如果我們不只是兩次，而是很多次不得不從頭做起的話，那末，這正表示出我們沒有偏

見，是以冷靜的觀點來處理我們在世界最偉大的任務的。」（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就是說：我們對人民負責，負有歷史上偉大的任務，要去掉偏見，要冷靜地找到錯誤的根源，敢於改正錯誤，從頭重新做起。列寧說：

「如果一切共產黨員，負責的工作人員，都能明白地意識到：我們不會做事，我們必須從頭學起，那時，勝利就一定是我們的了——在我的意見看來，這就是一個最根本的結論。」（同上）

善於學習，則我們一定勝利。這就是列寧的結論。

列寧曾經反覆地描寫了當時俄國解放之後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共產黨人的批評與期待：

「……在現時，農民正以信用貸予我們……他們會說：「好吧，如果你們現在還不能這樣做的話，那末，我們就等一等吧，也許你們會學會的。」不過，這種信用不能是無窮無盡的。」

「這一點，我們是必須知道的，在獲得信用之後，要立刻着手作的。應當知道：這個農民佔多數的國家不再給我們以信用的時機，它要求兌現（要是用一個商業上的術語來說的話）的時期，日益迫近了。他們將說：「現在就是這樣吧，親愛的統治者們，你們在延期這麼多月和這麼多年之後，一定能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幫助我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餓及破產的辦法吧。你們是能夠有所作爲的，這一點，你們也會經證明過了。」我們不可避免地將要碰到的試驗，就是這樣；歸根到底，這個試驗將要決定新經濟政策的命運及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命運的。」（同上）

「資本家是會辦供給的。但是他們作得非常不高明，他們是強盜式地作的，他們侮辱了

我們，他們掠奪了我們。那般的不知共產主義是何物的單純工人和農民，都是知道這個的。

「但是資本家總是會辦供給的，你們會嗎？……你們都是一些傑出的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你們所担負的那事業，經濟事業，你們却是不會作的。」這就是農民——而且通過農民，還為很多工人——在去年（按：指一九二一年）對共產黨所作的最單純最致命的批評。……

「需要來一個真正的檢查。資本家正在併肩地活動着。他們正在強盜般的活動着，他們惟利是圖，但是他們是作得很巧妙的。但是你們呢？——你們試用新的方法作一下吧：你們並不獲利；你們的共產主義原則，你們的理想是好極了，這些原則和理想寫得這樣美麗，老實說，你們是理應入天國為聖賢的——然而你們會做生意嗎？實在需要來一個檢查，一個真實的檢查，這並不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加以調查和責罰的這種檢查，也不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加以懲罰的這種檢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種的檢查，而是站在國民經濟見地上的那種真正的檢查。」

「允許共產黨人延期兌現，已經有過好多次了，貸給他們的信用之多，也是任何其他政府所從未得過的。自然，共產黨人曾經幫助農民從資本家與大地主底壓迫下解放了出來，農民是極重視這一點的，因此，他們給了共產黨人以延期兌現的信用，但這種延期，總有一定限度的。……然後，就要來一個檢查的：你們能不能把事情經營的不比別人壞呢？舊的資本家是會做的，而你們却是不會的。」（同上）

二十五六年前列寧所描寫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當時在經濟工作上還很生疎的蘇聯共產黨員所作的批評與期待，現在在我們這裏，也正是遇到了。我們正遇到着類似的批評與期待。很多人批評我們，覺得不但商業，而且工業，資本家要比我們會搞。我們這裏的農民也期待我們在幫助他

們從封建半封建及官僚資本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之後，能够更『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辦法』，繼續幫助他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餓及破產』。我們這裏的農民也期待我們能多供給他們一些物品，期待我們善於把工業和農業聯繫起來，善於把農民在經濟上聯繫起來，並使他們避免投機商人買賤賣貴的壓迫；希望我們要善於和破壞國民經濟的投機商鬥爭。我們這裏的農民也相信我們是能够這樣做的，因為在我們領導之下，他們已親身經驗根本的利益，並相信我們對人民事業的忠心，相信我們的能力。所有中國的人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人是翻天覆地的最能幹最了不起的中堅人物，都知道我們什麼都能够學會，並會學得比別人高明，以至可能高出萬倍，只要我們肯學的話。如果中國共產黨人是不能幹的話，中國也就沒有希望了。但是，在我們解放區，不論工人，農民，或其他人民，除了高興我們已經兌現的東西之外，對於其他還沒有兌現的東西，也是期待我們不要拖延時間太久，而是要更快地兌現。當然，我們一些根本的辦法是有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同樣地早已指出了我們在進行土地改革之後，繼續解脫農民貧困的道路，可是我們很多地方不會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方針去做，不會具體化，或者做得很粗糲，做得很不切實際，很不耐心，所以就延長了兌現的時間。

毫無疑問，我們也正在碰到試驗，在整個經濟戰線上（包括工業、農業、商業、金融）的試驗，而這個試驗將要決定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命運以及將來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命運。

毫無疑問：蘇聯共產黨員在列寧與斯大林的指導之下，結果是學得那末出色，做得那末驚天動地，那末，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就一定不會辜負我們中國人民的期待，凡是蘇聯共產黨員能够做到的，我們便也可能同樣做到，而根本的條件，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要能够像蘇聯共產黨人那樣善於學習。

列寧認爲必須三番四覆地學習，學了不會又學，學了不會又學，一直要達到目的。

「我重復說一遍：由於我們有正確政策的結果，我們從人民大眾那裏獲得了信用和延期兌現，用新經濟政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期票，但是在這種期票上沒有載着年月日，它們將何時要求兌現，你是不知道的。這就是危險之所在，這就是政治期票和普通的、商業上的期票不同的特點。必須把我們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點上，而不要以爲在一切國營托拉斯及合辦公司中有着負責的和優秀的共產黨員爲滿足，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爲這些共產黨員不善於作生意，他們遠不如在大工廠及大公司中受過訓練的那般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再用那同樣的偉大的俄羅斯語來說，共產黨人的自負心在這裏還依然存在着。問題是在於負責的共產黨員！——雖然是最好的，雖然是非常誠實，忠心耿耿的，雖然他曾經忍受過苦役而不畏死難，但他却不會做買賣，因爲他不是一個經營商業的人，他沒有學習過怎樣做生意，也不願意學習，也不了解他必須從ABC學起。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幹過世界上最偉大革命的革命家，一個爲衆目所注視（如果不是爲四十個金字塔所注目；則無論如何是爲歐洲四十個國家所注目）而抱着從資本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希望的人——他應當從一個普通的店員學習起，這個店員有十年的商店經驗，他懂得怎樣做生意；而負責的共產黨員與忠實的革命家，却不儘不知道經營商業，而且甚至他還沒有覺悟到他不知道經營商業這回事。」

「因此，同志們，如果我們能把這種初步的愚昧與無知糾正過來，那末這將是一件巨大的勝利。我們在離開這個大會時，應當確信我們還不曉得這一點，以後應從ABC學起。畢竟我們還是革命家（雖然有許多人說——這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已經官僚化了），我們能够理解這種簡單的事情：即是在一件新的非常困難的工作上，應當善於好幾度從頭

做起；如果在開始以後，你碰壁了，那末你再重新開始，那性才改作，直到你達到你的目的為止。不要因為你是一個共產黨員而裝腔作勢，而再自高自大；要知道一個非黨的店員，也許是一個白黨。我們就確定他是一個白黨吧——很善於從事在經濟上必不可缺的一些事情，而你却是不會的。如果你是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有着成百的官職頭銜，又是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功臣」，如果你理解這一點，那你一定能達到你的目的，因為這種事情是可以學會的。」

「雖然在過去一年間（按：指一九二一年），我們有了小小的成績，但這些成績是微不足道。主要的事情，是一切共產黨人還沒有這種廣泛的認識和覺悟，就是在目前，我們——俄國負責的和最忠誠的共產黨員的這種本領，比任何一個老店員都要差些。我再重復地說一遍：我們必須從頭學起。如果我們認識了這一點，那末，我們的考試是會合格的了。這一考試是很嚴重的，這一考試是由日益迫近的財政危機所造成的，是由我們所從屬的與之聯繫而不能分離的俄國的和國際的市場所造成的……這一考試，是極嚴重的，因為在這裏，人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的。」（同上）

顯然，列寧告訴了我們：首先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廣泛的認識和覺悟」（聽呵，是廣泛的認識呀，是廣泛的覺悟呀），知道了在這經濟工作方面我們比別人不行，而後我們才會去認真地學習，而後我們的考試才會合格。

因為社會主義與私人資本的「競爭是非常地激烈的」，當時列寧是這麼警告的：「這一考試是極嚴重的，因為在這裏，人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的。」列寧並指出這一考試將由十分痛苦的財政危機及內部的和外部的市場上的危機表現出來。

列寧指出了管理專業的技能與文化程度是相關聯的：

「這裏，須要明白地提出問題，我們的力量究竟在那裏？我們缺少些什麼東西？政治的權力是十分足夠的。這裏未必有人會說，共產黨人，共產黨，在某一個實際問題上，在某一個事務機關中，是缺少權力的。基本的經濟力量是在我們的手中之一切帶有決定意義的大企業、鐵路等等，都在我們手裏。……缺乏什麼東西，這是一目了然的：現在感到缺乏的，是管理國事的那部分共產黨員的文化程度。如果以莫斯科為例——它有負責的共產黨員四千七百人——如果我們拿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為例，那末我們就要問一問：究竟誰在領導着誰呢？我非常懷疑是否能夠說：那些共產黨員在領導着這個巨大的機構。老實說一句，並不是他們在領導着人家，而是人家領導着他們。這裏發生的事情，正如同童年時代人家講給我們的歷史故事，人家教我們說，有一個時候，一個民族征服了另一個民族，戰勝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則成了戰敗者。這是很簡單明瞭的。但是這些民族的文化如何呢？在這裏，事情就不大簡單了。如果戰勝的民族，其文化高於戰敗民族，則前者迫使後者接受其文化；在相反的場合，則戰敗的民族迫使戰勝的民族接受其文化（按：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就是：戰敗的漢族迫使戰勝的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洲諸族接受漢族的文化）。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是不是也發生了這同樣的事情呢？這四千七百個共產黨員（這已近於一師的人數，並且他們全體又是最優秀的），是不是也服從了他人的文化呢？是的，在這裏人們可能得到這樣的印象，以為在這種場合之下，戰敗者有着高度的文化。但實際的情形，決不是如此的。他們的文化是很可憐的渺小的。但是它比較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為這些共產黨員缺少管理事業的才能。共產黨員在領導某一機關時——有時，怠工者們故意巧妙地迎合他們，以便利用他們作為掩護物——常常被人欺騙和愚

弄。承認這個事實，自然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情；然而我認爲這一點是必須加以承認的，因爲在現時，這正是問題的焦點所在。……」

「蘇聯與俄國共產黨的負責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否會理解到他們是不會管理呢？他們是否覺察到，他們自以爲是領導人家，而事實上他們是在被人家領導呢？如果他們覺悟到這一點，那末他們自然就能學習。同爲這是能够學習到的。爲了這，是應當學習的；但是我們的同志却並不學習。我們的同志到處發命令出佈告，然而結果却與他們所希望的相去甚遠。」

（同上）

在革命勝利的初期，我們是沒有法子不承認我們的文化是比較別人要低些，在我們中國，這事實是同樣明顯的。雖然在我們這裏，地主階級也吧，資產階級也吧，它們的文化程度，是更加可憐，更加渺小，但是還是像列寧所說的一樣：「它比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工作人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爲我們缺少管理事業的技能」。這樣，我們是不可能依靠發命令出佈告來解決問題的，我們必需而且也只能依靠學習來解決問題。在這裏，驕傲就會是愚蠢以至滅亡。

一九二一年四月間，列寧「論糧食稅」即已指出：

「不要害怕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門家「學習」，其中也向商人，也向小的合作社資本家，也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應按另一種形式，但實質上是與我們會向軍事專家學習並學會了的一樣。「學習」的結果，只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做得比旁邊資產階級專門家所做的好一些，要能够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發達起來。爲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決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

寫這些話過了約近一年，列寧又說：

「如果共產黨人能够用他人的手來建設經濟，而自己則向這資產階級學習，並使資產階級走上利於我們所要走的道路時，那我們便能管理這種經濟了。但是，如果一個共產黨員自以為我既是負責的共產黨員，我什麼都懂，我所戰勝的人要比店員高明得多，我們在前線轟殺過，並且還不是同樣的人撕殺哩，——正是這類佔優勢的情緒在戕害我們。」（同上引在聯共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因此，列寧指出了要善於與非黨人員合作：

「……務須辦到這一步，即：使那些與我們合作並在數量上遠超過我們好多倍的大批份子，能够這樣來進行工作，以便我們能善於監督和管理他們的工作，我們能理解這種工作，能用他們的手作出對共產主義有益的事情來。目前形勢的中心關鍵就在這裏，因為雖然有個別的共產黨員已經理解了和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我黨的廣大羣衆對吸收非黨人員參加工作一點之必要，還沒有認識。……」

完全可以明白：列寧當時的這些意見是適用於現在的我們的。

我們要善於學習，要學習使自己會建設經濟；要學習在公營企業中，在合作社企業中，一方面，善於與非黨的專門家合作，善於向他們學習技能，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和暗害的特務分子、破壞分子及怠工者作鬥爭；要學習在建設整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事業中，一方面，善於與那些擁護新民主主義權、經營正當營業而能够並有能力組織生產的「文明的資本家」實行經濟的聯盟與經濟的共處，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與那些經營投機事業而破壞國民經濟建設的「不文明的資本家」作鬥爭。而在這一學習過程中，我們是必須盡量發揮各地方各部門的創造積極性的。正如列寧「論糧食稅」的結論上所說過的：「在振興農業與工業的周轉中，無論如何要在各方面極力發展地方的主動性，首創性和獨立精神。研究這方面的實際經驗，這種經驗儘可能要是

各式各樣的。」

如果有人擺起官僚架子，表現官僚習氣，既不善於學習這樣，也不善於學習那樣，而辦起事來一場糊塗，那就該怎樣辦呢？列寧主張把他交給法庭，加以審判，以便證實他是否一種犯罪之人。列寧指出：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是好的，並不是犯罪之人，可是，許多人並不善於處理實際工作，因循苟安，雜亂無章，胡衝亂撞。列寧說：

「在我們的鬥爭中，我們必須記牢：共產黨員是需要深思熟慮的。他們可以很漂亮地告訴關於革命鬥爭，關於全世界鬥爭狀況的事情。但是，爲了打破絕望的貧困與窮乏，則須要成爲一個深思熟慮，有效養，有條有理的人；可是他們不會這些。如果我們對負責的共產黨員加以指責，說他們作事不誠實，那是不對的。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可說不僅是誠實之人，而且證明了他們在沙皇制度顛覆以前以及革命之後的最困難的條件下面，都是忠於革命的人，可以說他們都是供獻了他們生命的人。因此，要想在這方面找出事業的原委來，那在根本上是錯誤的。我們所必需的，乃是對於最單純的國家事務之文化的處置。我們必須理解，這種事務是國家的事務，是商業上的事務；如果有何種障礙的話，就應當善於克服這些障礙，將那些犯有官僚習氣的人交給法庭。我想無產階級的法庭是善於懲辦的，然而爲了懲辦起見，那就應當找到犯罪的人。我可以向你們担保，在這一次的事件（按：列寧指當時一個向外國購買食品的事件）當中，是不會找到犯罪的人的，請你們都仔細考察一下，就可知道犯罪的人是沒有的，而所有的，只是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專情而已。……沒有一個人是善於處理事情的；沒有一個人懂得對於國家的事務是應當這樣來處理，而不應當那樣來處理。一切白黨及怠工者，都恰恰利用了這一個弱點。」

列寧所責備的那種從事「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的人，也就是我們這裏

平常所指的爬行的經驗主義者與煩瑣的事務主義者。在我們解放區，同樣確是如列寧所指出的：「問題的要點不在於握有政治權力，而在於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善於避免小的磨擦，以便國家經濟不要終斷。」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經驗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變成「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呢？除了善於學習又學習，以便提高自己管理事業的技能，提高自己的文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使得我們善於處理事情，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並使我們經營和管理的事業能夠迅速地趕過別人與競爭過別人呢？

X
X
X
X
X
X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對於蘇聯共產黨工作所作的結論，現在同樣地變成我們今天在中國解放區從建設工作的結論。列寧說：「現在，全部關鍵在於，先鋒隊不要害怕教育自己，改造自己，公開承認自己沒有充分準備和沒有充分本領等等。全部關鍵就在於現在要協同更無限廣泛和無限強大的羣衆前進，務必協同農民一起前進，用事實、實踐和經驗證明給農民看，我們是在學習，並要學習來幫助他們，領導他們前進。在俄國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在俄國目前的生產力狀況下，只有極緩慢地，極小心地，腳踏實地，千百次實際檢查自己的每一步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時的演說）

這結論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陝甘寧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大會上所作的演講的最後兩句話：

「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

中共東北鐵路黨委會

關於實行乘務負責制的決定

負責制是消滅工業生產中無人負責現象的有效辦法。負責制就是要做到由一定的工人集團（幾個工人，二班或三班工人）經常使用一定的機器，使每一個人對一定的機器和一定的工作負責。採用負責制，必然提高工人對生產工具的責任感，愛護心和創造性，因而延長機器的壽命，增加生產的效率。負責制的政治基礎在於：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企業是為人民所有，為人民服務，在這些企業裏，沒有人剝削人的關係。正因為如此，工人能以主人翁的態度，負起自己的責任，自覺的擁護和實施負責制。這是資本主義國家裏的企業所夢想不到的。鐵路黨委關於乘務負責制的決定，對我們新民主主義的企業管理提供了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原則問題。除批准這一決議在鐵路上實行外，其他工業部門都應該研究鐵路的經驗，將負責制這一原則加以適當而有效的運用。

東北局 十月四日

一、東北鐵路黨委批准最近機務會議所通過的關於在全路實行乘務員負責制（一般稱為包車制），廢除輪乘制的建議案。我們認為這一決議案解決了鐵路業務上極其重要的一個原則問題。

二、乘務員負責制與輪乘制兩種相反的制度的利害，不僅為杜局實際試驗的結果證明，而且在蘇聯對這個問題早已做了明確的結論。蘇聯鐵路採用乘務員負責制，這種制度是建築在勞動者的自覺基礎上的負責制，即由一定數量的乘務員（二班或三班）固定地使用一台機車，由他們對機車負全責。實行這種制度的結果，必然增強乘務員對於機車的責任心，愛護心和創造性，使機車保持良好狀態，因而延長機車壽命，增加機車的牽引力和工作效率。舊資本主義國家的鐵路則採用輪乘制，即將全段的每台機車給全段的乘務組輪流使用，同時增多檢點員來檢查機車的狀態。實行這種制度的結果，必然大大減低乘務員對機車的責任心與愛護心，因而增加機車的破損故障率，減低機車的壽命和使用效率。資本主義國家的鐵路不能採用乘務員負責制，不能不採用輪乘制，因為他不可能信任乘務員對機車負責。

三、乘務員負責制是負責制在機車乘務工作上的具體表現。應該確定這樣一個方向，負責制的原則應當逐步地運用到各方面工作上去（例如機器的負責制，調度車輛工作的負責制等）。

四、從一年來研究乘務制度的結果中，應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學習世界各國管理鐵路的經驗。主要地應當學習蘇聯的經驗。把這些經驗根據中國鐵路的具體情況加以運用。因為第一、我們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鐵路就其為人民所有，為人民服務和鐵路內部沒有剝削關係這一實質來說，是和蘇聯的鐵路一致的。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鐵路相反的。第二、蘇聯鐵路在三十年來的建設過程中，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管理鐵路的經驗，早已批判地加以吸收，我們特別重視蘇聯的經驗，可以使我們少走彎路。當然資本主義國家管理鐵路的經驗，亦可供我們的參考，捨去其有害部份，吸取其可用部份，但是決不應當把資本主義國家鐵路管理的經驗和蘇聯鐵路管理的經驗等

置齊觀。應當在思想上和在實際措施上堅持主要學習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驗的原則。

五、從業務制度這一問題上還應當得出另一個結論：我們對於新鮮的事物，先進的科學理論，應當具有虛心鑽研的態度和敏銳的感覺，應該防止和克服拘泥於舊鐵路的經驗中的陳舊和落後的部份，那種經驗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毛病（然當，舊鐵路經驗中有用的部份可以而且應當採用）。

六、各級黨的組織對這個決定，應當有計劃地組織討論。將負責制的精神貫徹到各項具體工作中去，檢查或消滅任何無人負責現象。應當在業務員中間進行深刻的教育，使大家了解，國家把最寶貴的財產——機車交給他們負責使用，他們就應當以主人翁的態度，即高度的責任感和積極性，來回答國家對他們的無上信任。

東北鐵路黨委會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在瀋陽工人代表會上的講話

陳雲

同志們！今天的會開得很好，各廠的代表都反映了許多情況和工友們的意見；特別好的是從這些意見中看到我們工人不僅是關心工資、福利和其他生活上的問題，而且更關心生產建設的問題。這表示我們工人階級確實具有國家主人翁的氣派。在橋樑與國民黨時代，你們決不會提出這些問題，他們也決不讓你們提出這些意見；只有現在，在人民政府之下，你們才熱烈地發表意見，關心國家生產建設的大事。這證明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為大家「當家」的，是遵循工人、農民、人民大眾的意見辦事的。工人不僅是工廠的主人，又是國家的主人。今天這個會上，大家都充分表現了這些主人翁的精神，表現出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很高，這是特別值得高興的事。請代表們回去告訴你們廠裏的工友們：政府一方面要幫助大家盡可能把生活改善，凡是目前辦得到的事，一定辦；另一方面也要靠大家挑起担子，共同把生產搞好，早日打倒反動派，只有這樣，我們大家的生活改善才有可能。

這個會開的很有意義，以後還要經常開這樣的會，以便能經常把工廠的情況和工人的意見反映交換，改善我們的工作。同志們，共產黨領導革命二十幾年了，現在革命力量這樣強大，全國勝利就要到來，是依靠什麼法寶呢？沒有別的，就是依靠大家出主意。「三個臭皮匠，湊個諸葛

亮」，有事找大家開會商量，辦法就出來了。我提議：以後開這樣的會，鐵路局、工業部、後勤部等，各個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員都要來參加。

大家今天提出的問題，凡是當前應該辦、可以辦得到的事，一定盡力辦去。但是我不能說你們提出的每個問題我都能馬上回答，因為對於各個工廠的具體情況不了解，就難以作具體的答覆。比如某某人的工資評得不合理，這只有工廠內部才能討論解決。工友們將原諒我今天不能對你們的每個問題都作答覆。但是，我一定負責把大家的意見分別交給各個有關的部門，請他們斟酌辦理。

甲、關於生活問題：

工資 爐煤 糧食 玻璃窗

大家所提的意見，大約可分這樣幾類，現在我扼要來談談。大家提的關於工資、生活和福利方面的意見，這當中有些是目前可以辦得到的，就應當辦起來。比如每月工資分兩次發，每個工廠設立一小圖書室，這都是可以辦到的。又如家庭在山海關、唐山等地，現在要接回來，這也是能辦到的，你們可以經過職工會去領路條；過去國民黨統治時沒有報上戶口的，現在當然應報上戶口，這也可經過職工會來辦。

還有些事情也是應該辦的，但在目前却有很多困難，希望大家能體諒。

第一件是煤炭。現在發的是爐煤，不好燒，早起做飯困難，還耽誤上班。為什麼發爐煤呢？我把緣由告訴工友們。瀋陽解放時接收的大部分都是樺子澗的煤，只有兩萬多噸撫順煤。東北大軍進了關，每天得多少列車給他們運給養草需，火車頭又非燒撫順煤不可。大家想想，是把撫順

煤發給大家做飯，讓進關的人民解放軍餓肚子打不下平津好呢？還是只好讓我們後方工友們和家委屈點，用爐煤做飯，把撫順煤給人民解放軍運車需用好呢？當然只好大家委屈點。爲什麼撫順這樣近運不來煤？工友們！撫順煤礦叫國民黨破壞得不成樣子：露天礦光採煤不剝土，坑洞給水淹滿，現在三萬多工人每天才出三千來噸煤，煤礦本身就用掉一半多。撫順礦要經過一個時間才恢復得過來。阜新煤礦坑井也盡是水，出煤這得一個時候。北滿倒是有煤，但是一時不能大量運過來。這是火車不得空的原故。總之，人民解放軍到前方打仗，解放平津的工人階級和那裏的人民要緊呢？還是後方燒煤要緊呢？當然是打仗第一，不徹底打倒反動派，工人階級的勝利就不鞏固。爲了全體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只有暫時忍受一下燒爛煤的困難，這種情形要請代表們回去給大夥說清楚。政府不是不關心工人生活，現在正在從各方面想辦法，只要說運到，就給大家發些好煤。

再一件大家提出的，發糧食的地方太少了，發起來太慢。是的，幾千人到礦把人的工廠，一兩個地方發糧，的確不夠。拿普通一個縣城打比，城裏居民五六萬人，有多少米糧油鹽煤炭？一萬人的工廠加上工人家屬，差不多抵一個普通縣城，要開那樣多的糧米油鹽煤炭當然不是件簡單事。從全體來看，這是一件很大的事。光十二月份瀋陽所有公營企業的工資中，僅糧煤二項共三萬五千噸，得一千一百六十六個車皮裝；把這些東西在幾天之內再分發到各廠去，這又是一件大事；再要從工廠發到每個人手中，還要發得快，發得好，更不是容易辦的事。這件事需要代表們回去號召大家出主意，商量個好辦法出來。要大家來參加工作，幫忙辦或者組織工廠消費合作社。

還有一件事代表們今天還沒有提出來，這就是現在的糧食還不算好，以後還不能完全保證都發好糧。這件事也是個困難。政府的糧食都是農民交的公糧，翻身的農民大多數都是交好糧

食，但也有少數覺悟較差的農民，交的糧不大好。公糧太多不易保管，特別苞米容易生黴發霉，一時翻騰不到，就霉了。所以發的糧食總難像市場上私人賣的那樣好。如果工資都發錢讓大家到市上去買，票子就要毛了，結果還是大家吃虧。政府當然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給大家發好點的糧食。但有時遇到不好的，就要請大家體諒這個困難。

還有，工廠的玻璃窗叫國民黨飛機震壞了，做工的時候很冷。現在造平板玻璃的工廠還沒有復工，只好暫用洋鐵片或木板釘補一下。當然還是冷，而且光線不好，這也要請大家暫時忍耐，等玻璃廠開工就好辦了。

另外有些問題，也是要靠大家商量決定的。如有些部門輕重工業怎樣分法，在那裏的工資怎樣評定才更合理等等，都是要靠大家回去，召集本廠工友，會同廠裏的管理方面，大家商量着辦。

乙、革命的目的，是爲了勞動大眾的

幸福，但必需澈底打倒反動派。

今天也有許多代表說，現在的生活，比國民黨在時好了。是的。但是從工人階級革命的目的來看，我們現在的生活還是很苦。革命的目的是爲了勞動者人人有吃有穿，而且要吃的較好，穿得較好，像經過了三個五年計劃建設的蘇聯的工人生活那樣。我們現在的生活還差得很遠，要達到那樣的生活水平，還需要走一段很長的路。目前在這段路上的絆腳石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有它在，我們的生活休想到那步田地。中國工人階級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壓迫上百年了，現在眼看它們在中國就要垮台，蔣介石却叫喊起來：「不打了，我要和平！」他想叫人民鬆手，讓他休

息一會，以便捲土重來。我們能讓嗎？（代表齊聲回答：不讓！）對，決不鬆手，要堅決把反動派澈底打倒。消滅了反動派，我們才能全心全意來發展生產，建設我們幸福的將來。蘇聯革命成功以後，經過三個五年計劃，人民生活才一天天好起來。我們在全國打垮國民黨反動派以後，也還要艱苦奮鬥來一次大建設。上了歲數的工友也許灰心：「還要多少年建設，我等不上了。」你等不上，還有你的兒子孫子；我們工人階級不是光爲自己，是爲整個人民大眾，爲我們的後代子子孫孫永遠的幸福。工人階級這多年來的奮鬥，就是爲了不能忍受被壓迫被剝削的痛苦，爲了追求美好的生活。毛主席領導革命也就是爲了勞動大眾的幸福。一百零一年前，馬克思就寫了「共產黨宣言」，號召工人階級起來革命。自求解放。直到三十一年前才出了個蘇聯，那裏的工人階級革命成功了。中國工人階級奮鬥了三二十年，現在就要成功了。瀋陽的工人階級從舊中國反動統治，到偽滿日本壓迫，又經過國民黨的二滿洲，受了幾十年苦，到去年十一月二日，瀋陽的天下才變了。十一月一號，還是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十一月二號就變成了工人和人民大眾的天下了。這叫做翻身，看起來就是一天變過來，但這是奮鬥了三十年的結果。就是全國解放之後，要達到吃好穿好，也要靠我們大夥自己努力，而且要計算到這是一段不短的路程。

丙、關於學習問題

大家提出的關於學習方面的意見，表現出工人階級強烈的上進心。入訓練班學習政治知識，這是應該充分滿足大家要求的。要求學技術、翻譯外國文的工業書籍，編寫各種工業知識與經驗的小冊子，這是很好的意見，這些事都應該逐步地盡量辦起來。有的還要求入專門技術學校深造，這個意見也是好的。我們的工程師不光是學校畢業的學生能當，還要挑選政治覺悟高，工作好、肯用功、有上進心的工人，到學校去學習，提高他們的文化科學水平，把他們的生產經驗與

科學原理結合起來，這樣就一定可以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工人工程師，這個辦法蘇聯已經實行多年了，他們培養了很多工人出身的工程師，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但是，這種專門學校我們這裏馬上還辦不起來，現在可以先辦些訓練班、補習班、補習夜校。

丁、關於職工團結問題

有代表提出了工友們對於工廠個別職員有些意見。我們的看法應該如此：工人是工廠裏直接勞動者，人數最多，是最重要的。許多職員過去有一種缺點，就是輕視勞動者，瞧不起工人。覺得自己穿長袍握筆桿，就是上等人，其中有的人有過對不起工人的地方。但是，要認識職員也是生產中不可缺少的，沒有職員畫圖、寫賬、打算盤也不行，沒有工程師和管理人員更不行。而且將來有許多工人還要當職員、技師和管理人員。

目前，那個工廠的那部分工人對那個職員之間有了意見的話，那是應該加以解決的。解決的辦法應該根據這種意見的來源，再把中共中央東北局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關於公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中所寫的北滿經驗作為參考，規定適當辦法。其目的是達到除了個別作惡甚多的職員，必須開除出廠以外，各階級工友之間，團結一致，提高生產。工友之中如果受過那個職員的氣，如果所受的氣不大，又如果這個職員自我批評了而且道了歉，那麼工友的氣就應該了結。我們工人階級對於打倒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對於應該合作的員工之間的小「氣」應該看成是小事。工人階級是一個幹大事的階級，我們要解放全中國四萬萬七千萬人與全世界一二十萬萬人，要把人類數千年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推翻，建立新的合理的社會制度。我們的事業是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皇帝、總統也比不上的，蔣介石反動了二十來年，就要完了，日本法西斯統治滿洲也不過十四年，他們不論怎樣威風。頂多只能統治一國、進行幾十年。而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天下却是千

秋萬代的江山，全世界人民萬萬年的幸福。辦這件大事的工人階級，應該把大事小事分別開來，全力幹大事。只要員工之間的「氣」已經適當解決了，就應該團結一致，努力生產，支援前綫，把反動派打倒，以便創造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自由天地。

戊、關於生產建設問題

在生產方面，今天提的意見都是很好的。這方面工友們至少要估計到兩個困難。第一個是我們的老幹部對管理生產還不內行，我們還缺乏經驗。第二個困難是原料器材不足，目前又處在戰爭環境中，補充也很困難。因此，就需要工友們大家想辦法，需要工友們發揮工人階級克服困難的精神。想辦法節省原料，利用一切能找到的器材乃至已被當作廢物的東西，進一步能設法創造代用品。代表們回去後，就與自己的廠長經理商量，再集全體工友的意見，訂出三個月生產計劃，或者一年的計劃。大家回去要告訴全體工友，要大家挑起担子，不光是積極做工，還要真正盡主人翁的責任，在廠長領導之下管理工作，團結職員一起幹。此外，還要特別告訴全體工友們，要大膽提意見。凡屬對生產有好處的意見，關於工人生活也好，生產也好，都可以提，做得通的意見，經過管理方面和工友方面商定之後，就可以合理辦。現在管理方面不會不願意工人提意見。所以，工友們就應該對於廠裏的生產和工作大家負責提意見，商量辦法，把生產搞得更好。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中國人民銀行冀魯豫分行

在城市業務中的錯誤

——新華社——

中國人民銀行冀魯豫分行在各城市的業務，發生嚴重的違反國家銀行信貸政策的右傾錯誤。這一錯誤，在該分行去年十一月底所召開的總結半年來的城市業務的會議中，已有初步檢討。據該行聊城、濮陽、清豐、陽穀、博平、仙莊集、牛角店等城鎮辦事處和支行的初步統計：半年來共吸收存款中國人民銀行幣九千七百餘萬元，發放貸款五千萬元，出入匯款六千七百餘萬元。存款中公營企業佔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私營工商戶不足百分之八；定期存款佔百分之二·四，其餘均為活期存款，儲蓄存款根本沒有。放款中私營佔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公營不足百分之四，合作社就無貸款戶。在貸款性質上，工業貸款只佔百分之六·二，商業貸款竟達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存款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公營企業存戶，並不要利息，但該行在辦理存放款中，半年來所獲純益收入僅一百九十二萬餘元。從上述情形看來，該行半年來在城市業務上，犯了極嚴重的政策上的右傾錯誤。首先該行根本忽視了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國家銀行在城市金融工作中的根本任務，錯誤地將大量國家資本完全無限制地、無區別地去扶植私人商業資本的發展，削弱了國家經濟的成

長，放棄對合作經濟的扶植和領導。這種右傾偏向，實不啻對資本主義經濟路線的投降。其次，在貸款政策上，該行忽視了發展生產的方針，既不區別貸款對象是國營企業、合作社還是私營工商業，也不研究貸款的私營工商業性質是否有利國計民生，未重視工業貸款，却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款項貸給商人，而其中不小的一部分則貸給投機商人。這樣不僅不能發展生產，反而助長了破壞生產的投機商業資本的力量。第三，在利息政策上不僅未能採取「發展生產，公私兩利」的政策，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使國家資本同時得以積累壯大，反而浪費、腐蝕了國家資本。這表現在辦理存款中，銀行純益收入甚少。爲了糾正上述嚴重的錯誤和偏向，會議決定：第一，在貸款政策上，應深刻認識廣大公營企業的重要性，對今後公營企業的存款要求做到有組織有計劃。其次是貸給合作社，貸給小生產者組織他們生產，貸給那些急需發展而且可能發展的有利國計民生的普通私營工業。第二，在吸收存款方面，應大力吸收私人定期存款及儲蓄存款，以擴大資金來源。第三，在利息政策上，應本公私兩利原則及根據物價與各業利潤情況適當調整，以便一方面能有效地進行吸收公私存款，尤其是私人定期存款；另一方面則能起發展生產及積累和壯大國家資本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

臨清事件與國營商業

——新華社社論——

今天我們所發表的關於臨清棉價風潮的新聞，對於我們的整個國營貿易工作是一個嚴重的警號。這件事雖然已經過去了兩個多月，但它留給我們的教訓仍是沒有過去。例如最近某些接近前線地區糧價的上漲，就可說是臨清事件的某種程度內的重複。我們在臨清事件中所應該得到的根本教訓，可以用列寧這段話來表示：「與資本家比較起來，你是佔着優勢，因為國家政權在你的手中，只是你不善於運用它們」（俄國共產黨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的這段話，正像對準我們今天一切不善於領導市場、掌握物價，不善於領導私人資本的國營經濟而發的一樣。要檢討臨清事件，毫無疑義也應當從列寧指出的這個方向去尋找。

要從臨清事件來談目前的貿易工作，就不能不追溯一下過去的情形。我們知道，抗日戰爭以來的解放區人民政府的國營貿易工作是有成績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首先，是在對敵經濟鬥爭方面。各解放區雖然程度不同，但在排除敵偽商品，保護與發展土著生產，爭取必需的外來軍用物資等工作上，是有重要成績的。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調劑了解放區內物資的供需，相

對的穩定了解放區內的物價。但與這些成績同時，國營貿易工作中還存在着嚴重的原則性的缺點。簡單的說就是：財政成績多，經濟成績少。即是說，國營貿易在如何領導與控制私商，如何穩定市場，反對投機；如何保護小生產羣衆與消費羣衆的利益；如何協助建設供銷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的系統來聯系小生產及有計劃地分配爲工業生產與人民消費所需要的物資等等方面，是做得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

在這樣不甚健全的貿易工作基礎上，當然臨清事件以及類似臨清事件的發生就不是偶然的了。這是由於：第一，我們的有些國營貿易機關相當長期地沒有明確認識自己領導市場的重大責任，並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沒有深刻了解，市場的劇烈波動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危急性。第二，它們對商業資本的本質特別是它的投機活動的破壞性也認識不足。在臨清事件中，它們對私人商業資本的投機活動既未認真防範，也未設法制止，終至推動並幫助它們進行了投機破壞活動。第三，是不少的國營貿易工作人員還很不懂得商業，很不懂得經濟活動和市場發展的規律。因此，在臨清事件中，許多貿易工作人員所採取的步驟，就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盲目的和魯莽的錯誤。他們是如此輕率，以至簡直沒有估計到，由於他們的許多盲目的魯莽的活動，市場供求和物價將要發生什麼嚴重的變動，以及這個變動對於千百萬人民和人民的政府將要產生什麼嚴重的結果。第四，尤其主要的，這次事件是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各自爲政，無集中統一領導，無政府無紀律狀態必然要產生的惡果。如果兩區步調完全統一；不要互相搶購，則臨清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有這些就告訴了我們：雖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營貿易機關，擁有一切必要的條件，如雄厚的資本，便利的國家信貸，優先的交通條件，靈通的商業情報等，但是如果沒有或不執行正確的政策，即「不善於運用它們」時，仍然不能達到國營貿易的目的，終至會被私人資本主義打敗，並斷送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前途的。自然，在今天發生臨清這類事件，是不能過重地責備我們

那些經濟工作人員的，他們那樣作，可能完全不是從惡意出發。因為我們的黨還沒有認真地教育他們，使他們明確地懂得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人民政府也還沒有規定完備的經濟法令，使他們有所遵循。他們所犯的錯誤，大多數還是帶盲目性的。所以拿這些事件來教育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在目前十分重要。否則，我們就將完全不能對付今後的新情況。

我們必須明白，全國勝利後的新情況，使產生比臨清事件危險千百倍的事件的可能性，是大大地增加了。因為，首先，在這些已經解放及即將解放的大城市中，存在着我們從未面對過的龐大的商業資本，它們在國民黨統治下會長期從事於投機活動。那時，扮演破壞國民經濟主要角色的，當然不是它們而是國民黨官僚資本，但在國民黨官僚資本既經打倒之後，情形就變化了。如果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對它們不能加以控制，那麼，它們便將成爲今後破壞國民經濟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我們已經和即將面對着的，是大城市的生活消費、原料消耗、與集中的生產品的分配。這些都必須依靠繁複的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目前及今後國營貿易工作的責任是非常巨大地增加了。

國營貿易工作今後要怎樣才能担負起它的巨大而且重要的任務呢？怎樣才能不犯或者少犯像臨清事件一類的錯誤呢？

首先，是要一切國營經濟工作者樹立起對於私人商業資本的正確認識，然後才能談到對私人商業資本的正確政策。須知，在國營及合作社商業還無力完全來代替私人商業資本的條件之下，私人商業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少的。但每一次私人商業活動同時不能不是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中間剝削，每一個商業資本家不能在每一小時間隙投機。而在一當可供投機的空間擴大，例如，因戰爭而使物資流通受到阻礙，某些物資特別缺乏，幣制的不統一和變動，物價發生波動等等的時候，那時每一個「正當」商人，就都會去進行投機活動，在這時候的私人商業資本就變成

了國民經濟中的破壞因素（國營商業如果也照這樣做，也是一樣的破壞因素，而且為害更烈）。臨濟事件中的私人商業資本所表現的非常明顯：它們既剝削了生產者，又剝削了消費者，也剝削了國家的國庫，並使得兩區物價均形上漲。

當然，指出私人商業資本可能的危害性，並不是說我們不要保護工商業的政策了，不是的，我們仍然要堅決的執行下面這些保護與發展工商業的政策，即：一、保護工商業財產不受非法侵犯，嚴格保持封建地主的封建財產與對工商業財產的區分；二、勞資兩利的職工運動方針；三、有利於發展工商業的稅收政策。但是，在堅決執行了這些政策之後，那時候可能發生的主要危險是什麼呢？毫無疑義的，那時候可能發生的主要危險不是「左傾」危險而是右傾危險了。「糾左必須防右」——結束農村土地改革中的這一句口號，在目前對待工商業的政策中也是完全適用的。因此，我們對於私人商業資本的正確態度，便決不能採取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而應當是領導、管理和控制它們，使它們無法進行破壞性的投機活動，並走上有利於國計民生的道路。

第二，就是要澈底弄清楚並担負起國營貿易的任務。國營貿易的任務，是要和投機性的私人商業資本經過市場關係來作巧妙的鬥爭（行政命令只能幫助這種鬥爭），阻遏市場投機的可能性；是要保護生產者、消費者和國家經濟的利益，以正確的有利於生產的價格政策來對待它們；是要進行嚴密的調查統計工作，有計劃地收購與分配社會物資，滿足社會公私生產和消費的正確需要；是要把小生產者經過供銷合作社的系統組織在自己的週圍，以領導小生產等等。簡言之，就是要建立、鞏固和發展新民主的經濟體系中國營經濟的領導作用。但要達到這個目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機關及國營經濟系統就必須認真的做到以下的幾項重要工作。

甲、國營貿易系統，必須要有集中統一的領導，以便建立統一的收購和售出機關，統一的收購和售出計劃，統一的收購和售出的價格政策等等。不許各個國營經濟機關以不同價格到市場上

去互相競爭，甚至聯合私商去競爭。尤其不許到鄰區去競爭。當然，這些工作在目前應採取種種必要辦法，使其儘速而又有步驟地作到。首先在各個戰略區內部應當而且可能很快建立這種集中統一的領導。在各個戰略區之間，如一時還不能作到，也應隨時互相協商，作到步調一致。像此次臨清事件中華北、華東兩區各自爲政地互相競爭，以至不得求助於私人投機資本的重大錯誤，是無論如何不許繼續存在的。只有這樣，國營貿易機關，才有可能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有所幫助，才不至在私商的投機狂潮中驚惶失措，才能够在和私人商業資本的投機性、破壞性作鬥爭時，表現自己的戰鬥力。

乙、國營貿易系統，應建立起科學的調查統計工作，就是說，應該對於本區和外區市場的供給能力和需要狀況，包括人民生活消費品的需要狀況及公私生產的供給能力與需要狀況，逐步地作出週密的調查統計。這是消滅工作中的盲目性的根本問題。只有在掌握了這些最重要的調查統計材料之後，國營貿易機關才有可能定出統一的收購和售出計劃，才有可能調劑供求，才有可能能有計劃地分配物資給各個地區、各個消費者和各個生產部門（當然，這樣繁重的工作，不能單靠貿易機關一個部門去作）。這樣，就不僅實現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可能的計劃性，而且爲將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和分配作了必要的準備工作。這昇我們必須在長期努力中作到的。

丙、臨清事件還告訴我們，國營經濟沒有可能直接從散漫的小生產者手中購得其需要拿出來進行交換的生產品，同樣也沒有可能把自己手中的生產品普遍地分配給他們。這就是說，在國營經濟與小生產之間還缺乏一種必要的中間橋樑或聯系，因此也就不能組織和領導小生產者，而讓私人資本主義去和小生產者發生了聯系，使小生產者不是經過國營商業而是經過私人資本主義商業才得出售其生產品與獲得供給品。這樣，就使小生產者不得不受私人資本主義的中間剝削，不得不把自己附屬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體系內，如果這個情況的發展不被無產階級領導的國營商業和

合作社商業在廣大範圍內所代替，其結果必然是與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這個問題，只有在國營經濟與小生產者之間建立起了供銷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的系統，因而也就是說建立起了國營經濟與小生產者及消費者之間的聯系以後才能解決。這種供銷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是在國家經濟的幫助之下，由生產者和消費者自己組織起來的，其目的在於以盡可能低廉的價格供給小生產者以生活上和生產上的必需品，盡可能以公道的價格收購小生產者的生產品，使小生產者逐漸不受投機商人的中間剝削；是代國營經濟收購物資原料，及推銷成品，使小生產者經過供銷合作社的媒介而受國營經濟的領導。經過這些辦法，逐漸地把小生產組織起來，逐漸地克服小生產固有的自發性、盲目性、散漫性與無政府性，而同時也使國家經濟得到一個可靠的助手，來進行上述的統計、監督和有計劃的分配工作。

第三，臨濟事件說明，我們一部分同志還沒有完全學會或者簡直沒有學會如何做經濟工作，特別是如何做被人目為「市俗的」、「不體面的」的商業工作。而商業在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新民主主義下的國營經濟便是這種成分）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鬥爭（或叫競賽）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聯共黨史在總結蘇聯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新經濟政策初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同時並存而又進行鬥爭的時期的經驗時說：

「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生產的鬥爭。『誰戰勝誰』——問題就是這樣擺着的，爲要勝利，就必須經過盡量發展城鄉間的商品流轉而來保證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民經濟之間的結合。爲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須學會管理經濟，必須學會文明經商。」

在這個時期中，商業是擺在黨前面的諸任務的鏈條中的基本環節。不解決這個任務，就不能擴展城鄉間的商品流轉，就不能鞏固工農底經濟聯盟，就不能提高農業和使工業定出

破壞狀態。

當時，蘇維埃商業還是很薄弱的，共產黨員還沒有經商的習慣，還沒有熟知敵人——耐普曼（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私資企業家、商人、投機販子——譯者註），還沒有學會如何和他們鬥爭。私資商人，耐普曼會利用蘇維埃商業底弱點，而把布疋以及其他日用商品底貿易，抓到自己手中。關於組織國家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問題，就具有巨大的意義。」（該書第九章第三節）

因此，列寧在當時曾無數次地強調共產黨員要學會管理經濟，學會經營商業，他說：「以前資本家會辦理供給。雖然這件事情他們做得很不正當，用強盜的方式欺負了我們，掠奪了我們，……可是你們——試按照新方法去作吧：你們既無利潤可獲，原則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再好的，你們這些神聖人物，簡直可以活活的升入天堂裏去，——但事情究竟會不會作呢？」列寧說：「請看，在經濟方面我們必須要作的事吧：現在就是要奪得過平常的店員，普通的資本家，商人……我們要用全力注意到這點，不要以為在國家托拉斯和合股公司中，到處都是負責的優秀共產黨員而自安自慰——這沒有任何益處，因為他們不善於經營，比較那班經過大工廠大商號銀錢的普通資本主義店員要差一些。這點我們沒有覺悟到，這要用同樣美麗的俄文詞句說來，就是還存在有「共產主義的誇大狂。」」列寧說：「我們在這一年來極明顯地證明了，我們不會管理業務。這是主要的教訓。或者我們在最近這一年內證明我們會管理業務，或者是蘇維埃政權不能繼續存在下去。最大的危險就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意識到這點。如果全體共產黨員，負責工作人員，都明白瞭解到：自己既然不會，就得從頭學習，那時我們便會獲得勝利，據我的意見，這才是主要的，根本的結論。」（一九二二年三月，俄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當然，中國人民今天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和應當採取的政策，如前所說，是與列寧說這些話的時候不相同的。但是列寧向俄國共產黨員提出的這個「根本的結論」，對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員和中國的勞動人民說來，却有偉大的教育意義。我們想避免「共產主義的誇大狂」，就得「從頭學起」，完全學會做好經濟工作。事實已經證明了我們是完全可以能夠把經濟工作做得很好的，只要我們善於學習，我們就一定會得到像在軍事方面一樣偉大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臨清事件經過見本書附錄）

企業管理民主化

是改進生產的重要保證

——東北日報社論——

辦好一個人民企業，主要依靠兩條：一條是企業化的經營，一條是民主化的管理，兩者必須很好的結合。

關於企業化的經營方針，自六次勞動大會以後，已經開始受到各個國營公營企業的注意，並在實際工作中初步規定了各種制度在執行，如成本計算、生產論責制、勞動力組織、產品標準、工作標準、掌握技術、計件超額獎等專，並取得了或多或少或少的經驗，多少提高了生產效率。雖然在這方面，對於我們還僅僅是走了第一步，統一集中還很差，特別是今天我們還缺少一個精密的全面的生產計劃，但畢竟是在多數同志中創立了這樣一個觀念：我們不能長久辦一個與國家與人民無利的賠錢的工廠，使我們的生產不能前進一步。

可是關於管理民主化的問題，還沒有普遍地認真地受到了我們人民企業管理幹部的足夠重視，民主管理的觀念，在某些同志的心中還很淡淡，或者根本不存在。他們忽略了基本的一條：新民主主義下的人民企業與官僚資本企業管理方法的根本區別，即我們主要的依靠，是用民主方

法來發揮職工羣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其自覺的來改進生產，提高生產。換句話說，就是企業的管理要採用民主的方法，通過民主管理的方法，來加深與提高工人是工廠與國家主人翁的感覺，使大家能自覺自願的參加生產。而官僚資本企業唯一的依靠，是強力的行政管制——打聽、開除、逮捕、槍斃，以達到他們剝削工人血汗取得巨額利潤的目的。這種吃人的管理方法，自然只能引起工人消極與積極的對抗，因而產生怠工、罷工、浪費材料、損毀機器等破壞生產的行為，根本談不到積極性與創造性。我們必須堅決改變這種管理方法，才能改變工人的舊觀念，樹立起新的勞動態度，真正發揮他們的勞動熱忱而積極地工作起來。

現在有些企業行政幹部習慣於簡單的行政命令，缺乏羣衆觀點，把廠長負責任認作是「獨斷一切」。處理任何重大問題，不瀆不去傾聽羣衆意見。甚至不徵詢黨和工會負責同志的意見，認爲工廠管理委員會沒有用處，「工會只是找麻煩」，「生產任務迫切，行政工作忙，無法注意工會工作」，因而不顧不重視工會工作，不支持工會工作，甚至有無意地阻礙工會工作，不把有關於生產的重大問題提到工會中，提到代表會議，提到羣衆中去討論，使生產與工人的自覺相結合，使工人懂得爲什麼要生產，以及如何才能提高生產，而絕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就可以解決問題。這些現象是絕不能容忍的。必須認識：我們的企業管理幹部，是代表國家來管理工廠，首先是代表工人階級來管理工廠，而工人階級即是國家最主要的主人翁，因此首先要依靠工人羣衆來管理生產，否則實質上即是忘本思想的表現。我們常說，在人民企業中，工人羣衆是工廠的主人翁；那末，工人羣衆要問：我們對工廠中的一切重大問題都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我們怎樣作主人翁呢？再問：如果羣衆沒有主人翁的感覺，怎會發生主人翁的勞動態度呢？由於我們已往長期處在農村環境中，很難培養管理工業的幹部，現有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從農村、軍隊、機關轉來的，這些幹部或者對於組織軍隊，指揮作戰，在農村中進行土地改革，發動農民羣衆，或在機關

中進行機關工作是有辦法有經驗的，但對於管理最複雜的工業生產的經驗，掌握最科學的工業技術與工業知識，則應虛心承認是外行，是小學生，因此在目前工業建設中還存在着不少困難。而困難中之最主要者，即在於我們管理生產的領導上，缺乏大批有這樣經驗，這樣知識的幹部，因而要克服目前工業生產建設中的困難，其主要環節之一，即是依靠廣大職工，首先是長期勞動的工人。依靠他們的經驗和知識，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共同努力來搞好生產。我們的行政幹部必須清醒地解自己缺乏管理企業知識的弱點，把什麼「老幹部」、「老經驗」等一切驕傲自大的包袱放下，虛心向羣衆學習，學習羣衆的知識和經驗，並善於把羣衆的積極性組織起來，要相信羣衆的智慧和創造力是非常偉大可以克服一切困難的。如瀋陽附近的工業區，解放以來，職工們以高度熱忱，想盡各種辦法搜集器材，創製代用品，減少浪費，克服了復工生產中的許多困難。皇姑屯鐵路工廠工人打破各種阻礙使機車復活，修出北平號天津號火車頭，迎接北平天津的解放。本溪工人不僅克服了冬季不能作耐火磚的困難，而且比國民黨統治時期多生產百分之二十五，使煉鐵爐能提早復工。這類例子很多。但這種工人羣衆的積極性，如果沒有經常的民主管理的制度來保證它，是不能持久的。

當然我們這裏所說的管理民主化，與散漫無紀律的極端民主是毫無相同之處的。實現管理民主化的具體內容，就是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職工代表會議，真正確立職工羣衆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進一步發揚他們愛護工廠改進生產的積極性與責任心，使企業化的經營方針，科學的生產組織制度得到工人羣衆自覺努力執行的保證。

爲了克服目前企業領導中的各種弱點，南北滿各個國營企業，應迅速組織與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與職工代表會議，這是工業建設與工人運動中一個重大任務。工廠管理委員會是在上級國家企業機關領導下，爲企業中統一領導的最高權力機關。它的成員除廠長、工程師及生產中主要負

實人外，必須吸收相當於以上數量的工會或職工代表會議選出的職工代表參加。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集中各方面的意見，作出正確的決定，也才能真正體現出工人參加企業管理的權力，與其主人翁的地位和作用。

由於廠長是國家企業機關委派的全權代表，他是代表人民來管理工廠，首先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意志來管理工廠，因此廠長應為工廠管理委員會的當然主席，並具有一切有關工廠重大問題的最後決定權。但這個最後決定權的運用，絕不是說就可以不傾聽工人羣衆的意見，就可以以一切重大問題不與黨和工會負責人協商而獨斷獨行。恰恰相反，廠長應善於把一切有關工人的重大問題，如生產計劃、工資調整、人事變動、制度改革等等，提交到管理委員會與代表會議上去討論，作出適當決定，再由行政指令執行。只有當領導意圖變為羣衆的意圖，領導的決定變成羣衆的決定，才能高度發揮羣衆的積極性，百分之百地實現並超過它。如本溪煤鐵公司將生產計劃及如何克服復工生產中器材、技術、設備等困難，初步地發動了工人去討論，結果僅僅幾天工夫，工人們想盡辦法收集了二十多部車床，九十多件機器，數千萬元的器材，幾百噸鋼板水管子。這個例子說明：在我們前面雖有很多困難，但問題在於我們企業領導人能否善於虛心向羣衆學習，緊緊地依靠他們，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與積極性。能够這樣做，我們的困難就能逐步克服。其次，爲了統一領導協調行政、支部、工會三方面的的工作步驟，工廠管理委員會中應由廠長、支部書記、工會主任組成常委會，以便經常聯系會商了解全面情況，處理日常較大問題，以克服目前某些企業中各自爲政互相磨擦的不良現象；同時也可以防止三方面分工不明確，一把抓，沒有適當建立各自組織獨立工作的傾向。

職工代表會議，則是在工廠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直接聯系羣衆、動員羣衆、傳達討論實現領導決定的最有力的組織形式，各個企業應普遍地把它建立與健全起來，特別在瀋陽周圍新解放的

工業區，在正式工會未建立前，它不僅是職工參加工廠管理的最好的具體組織形式，同時還可由職工代表會議發起組織工會籌備會，選舉籌備委員，進行一切籌備工作，並担负起工會日常所作的發展會員、組織學習、評定工資、興辦職工福利和合作社等工作。

工廠管理委員會與職工代表會議的建立，是實現管理民主化的具體內容，也就是將過去官僚資本企業的管理改造成新民主主義企業的管理，樹立起職工新的勞動態度。我們的廠長經理及一切企業管理的幹部們，應該敢於正視與克服我們的弱點，有勇氣擺脫過去從農村中帶來不合於現實要求的各種觀點經驗與作風，虛心地向羣衆學習，處處關心羣衆，切實幫助工會，把你們百分之五十一的時間拿出來做工人工作，傾聽工人羣衆的意見，即解決任何比較重大問題的談話、會議，都找工人代表、積極分子或有經驗的老年工人來參加，這樣在解決行政問題時，就作了工人工作，才能使管理民主化不流於形式，發揮它的積極作用。這裏必須說明：我們強調管理民主化，決不是不要制度，相反的，要把生產搞好必須有嚴密的科學的管理制度，但是只有羣衆覺悟提高了才會自覺遵守制度，反對那些破壞制度的少數分子。我們強調管理民主化，絲毫不是減弱勞動紀律，相反的，樹立了新的勞動態度後，工人會自覺遵守勞動紀律，監督並制裁少數破壞勞動紀律，損害生產利益，即損害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分子。只有造成了羣衆的勞動熱潮，自覺的爲提高生產而奮鬥，我們的生產才能不斷前進，才能完成支援全國解放戰爭，爭取全國勝利迅速到來，把東北解放區建設爲奠定新中國工業化基礎的巨大而光榮的任務担負起來。

不要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

陳伯達

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在國民黨反動統治被消滅了的地區，接管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的企業及其他公共企業（工廠、礦山、鐵路、郵電、輪船、銀行……等等），把官僚資本的財產變而為人民的財產，並使這些企業很好地繼續進行生產，由為封建買辦勢力、官僚資本家的利益服務變而為人民的利益服務，乃是我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大任務之一。這個任務，現已日益繁重起來，需要我們同志更好地加以學習。

當着我們接管了如此龐大的、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官僚資本企業，我們應該採用怎樣的辦法去經營和管理呢？這乃是擺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一個非常迫切而重大的新的問題，我們必須加以解決。但是，一方面，由於目前軍事情況非常緊急，我們的許多幹部還在忙於軍事，無暇顧及其他；另一方面，我們的多數幹部對於經營和管理大的工商業又還缺乏經驗，他們還沒有學會這種工作，根據這種情形，並根據共產黨中央及毛澤東同志所已宣佈的工商業政策，我們對於所接

管的官僚資本企業，在目前應該採取下列各項辦法來處理：

第一、當着我們去接管官僚資本企業時，一般地不要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就是說，不要打亂它原來的技術組織與生產系統，而要保持其完整。

第二、應該鼓勵工人盡力保護，並責令原來在企業中服務的一切職員——工程師、技師、會計、監工等保護企業所有的財產（機器、房屋及一切資材）、文書、圖表，不得有所損壞；除開少數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及劣跡昭著者外，凡願意照舊供職的一切員工，應令他們照舊供職，支取原來的薪水和工資。如有在戰爭中逃亡，及不能照舊供職的負責職員，其職位可由原來的副手頂替，或者從原來職工中挑選適當者充當，如沒有十分必要，不應撤換原來的職工。

第三、由人民解放軍或民主政府派出軍事代表或政治代表，對於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實施監督。在特別鉅大的企業中，必要時設立監督部（或政治部），除派遣總代表外并分派代表到各工作部門和車間實施監督。但此項機構必須極其簡單，人員的配備只在絕對必要的限度之內，以免加重企業中的財政負擔。監督人員的任務，主要為下列各事：一、監督並保障生產的進行；二、防止反動分子進行破壞及怠工；三、學習管理生產，研究企業中的技術問題與財政問題；四、防止偷竊、貪污并消滅財政的浪費；五、在職工中適當組織關於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教育（這種教育應該是實事求是的，有條有理的，啓發式的，而不是形式主義的，勉強的，硬灌式的）；六、協助職工組織工會及消費合作社，發現並挑選職工中的積極分子和幹部。

第四、廢除原來企業中吸血的官僚制。在調查研究仔細分別之後，把那些和生產事業沒有聯系的寄生官僚逐出企業，淘汰那些不是生產的，非技術的，在事務上掛名而領乾薪的閑雜人員。

第五、在軍事代表或政治代表監督之下，所有在企業中供職的職員，實行有職有權的責任制，事情如進行不好，須向負責任者追究責任，如有犯罪者，則把犯罪分子交給法庭處理。監督

人員關於技術問題以及關於企業制度及生產組織事宜，如要有新的改變，新的計劃，應事先切實研究清楚，並和有關人員商量，並在必要時先和工人羣衆商量，而後作出決定，經過上級機關批准後，才得執行，決不應草率地魯莽地從事改變，引起企業中的紊亂，妨害生產。

第六、在目前軍事正緊的時候，如要即在全國範圍內合理地改訂工資制度，那是困難的。至於老解放區原來那種因近供給制度而來的工資制度，也不適用於大城市的大企業。因此，在接管官僚資本企業的最初一個時期內，不應該只憑自己主觀的想法，沒有妥當的根據，即忙亂地改訂工資制度與工資標準，而應該暫且實行原來企業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按照各項物價變動的情況與我們的幣值，加以適當的計算，使工人和職員的實際所得，不低於在解放前的實際所得。（在計算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工資時，則應以解放前一個短時期大約三個月 averages 的實際工資為標準）。同時，在這種舊工資的基礎上，爲着提高職工們在解放後新的追求進步的生產積極性和減低生產成本，可規定若干臨時辦法，對於那些積極工作，善於節約，愛護公物的工人、技師和各種職員，給以應有的獎勵，而對於那些怠工、浪費物資、偷盜、貪污、舞弊的人則給以應有的處罰。至於合理地改訂全國各企業的工資，則待有可能時，我們當召集適當的會議來加以處理。在目前企圖全面改訂原來的工資制，或以老解放區的工資制去改訂的原來工資制，都是錯誤的。但在某些地區，例如在東北已經初步訂立了比較統一的工資標準，則應保持并加以改進。

第七、所有各企業已實行多年的對職工各種獎勵制度，保險制度，例如企業中的退職金，養老金，撫卹金，假期照給工資制度及鐵路上的年終加薪等，凡過去已實行多年，現在仍在實行者，我們接管後，當一律照舊實行，不得取消。但國民黨在戰爭時期所實行的某些臨時補貼辦法，則可加以改變，這種改變亦必須使工人所實得者不少於國民黨統治時期。

第八、對於職工的考察，以在企業中的實際工作好壞爲標準。

以上這些辦法，雖然還不能合於理想地改善原來官僚資本企業的管理，但在目前情形下還是可以行得通的辦法。

我們在接管官僚資本企業後，對於企業中的職工的待遇及勞動條件，將來是必須也可能加以改善的，以在目前軍事時期，這種改善，一般還是不可能的。我們應向職工羣衆說明暫時不能改善職工生活的理由，但職工原有的生活水平及其業已實行多年的待遇與勞動條件，我們必須全部承認，盡一切可能照舊實行，而不應降低職工原來的生活水準，更不應取消企業中原來對職工有利的任何條件。但是因爲一時財政困難，不能全部發給職工工資及獎金卹金時，則須向職工說明理由，暫時地部分地欠發，請求職工原諒，以待將來財政有辦法時再行補發。同時又須向職工說明，在解放區由於實行土地改革，人民民主和生產節約，雖在戰爭期中，仍能保證物價上升的平穩，較之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騰通貨膨脹的情況，完全是兩個世界，改善職工生活實已有了初步保障。

很明白：我們接管官僚資本的企業機構，必須和我們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機構（即舊的封建的買辦的國家機構，包括軍隊、各級政府機關、憲兵、特務機關、警察、監獄等等）的態度完全區別出來。我們要打碎國民黨的政治機構，而代以人民的政治機構，要徹底破壞國民黨反動派一切殘暴壓迫人民的從中央到保甲的政治組織的政治制度，而代以人民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制度。但是，我們對於官僚資本的企業機構就不是什麼「打碎」的態度。我們反對打亂原來的企業機構，問題就是因爲它是經濟機構，是生產機構，而不是政治機構。（按：我們打碎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機構，但對於舊衙門的房屋和文卷之類也不是要打碎，而是要保護和保存下來，這好像在前線粉碎國民黨的反革命軍隊，解除他們的武裝，同時又必須把武裝保護與保存起來，轉而成爲人民的武裝一樣。除了黨辦首惡份子破壞份子以外，對於舊的政府公務員，我們並不是一律排斥，而

是在經過必要的訓練後，可以酌量任用的。這些不在本題之內，這裏不用多說。）

同樣地很明白：我們接管官僚資本的企業，和我們接管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機關也有一定的區別。我們保護一切文化教育機關，一切普通學校特別是屬於自然科學範圍的學校和課程，應該保存下來，繼續上課，那更是毫無疑問的。一切盡忠職務的教職員應該照舊供職，那也是毫無疑問的。但同時我們要知道：在階級社會中，舊的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所主持的文化教育機關，乃是服從於該統治階級的目的，使該項機關成爲其統治機構的附屬部分，其中學校的教育方針與課程，很多是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有的教員公開爲舊的統治階級辯護，撒謊造謠，而反對人民。舊統治階級的文化教育機關，包括舊的學校、報紙、電影、戲劇等，都不可避免地成爲該統治階級在精神上壓迫與麻醉人民的工具。因此，在人民成爲統治的主人之後，對於舊統治階級的文化教育組織制度，必須加以很大的適當的改組，使之適合於人民的需要，而在我們接管時期，首先要禁止的就是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之類的課程，并禁止國民黨特務分子繼續担任教職。至於我們接管官僚資本的企業，首先就還談不上改組那裏的技術與生產組織之類的問題。我們在接管官僚企業時，首先的任務是要使那些企業馬上有效地動作起來，爲人民進行生產；如要它馬上有效地動作起來，就不能夠隨便打亂它原來的機構，并且完全必須讓一切盡忠職守的舊的職工繼續工作。事實上，我們已有很多同志了解這些道理，學會了接管企業的工作，善于按照中央的政策處理問題，而且在解放的地方把接管工作做得很好，並使機器很快地轉動起來。可是我們也還有不少同志還沒有了解這些道理，還沒有學會按照中央的政策來進行接管的工作，他們在接管時，沒有必要地派遣不熟悉該項事業的人員去代替原來的人員，例如有一個地方鐵路局的工務、機務、運務三處處長被我們三個外行的同志所代替。結果使人家看我們同志的笑話；沒有必要地打亂原來的生產組織和技術制度，甚至是完全多餘地去改變名稱，例如有的地方一定要把監工改叫股

長，把工頭改叫組長等；尤其錯誤的，就是：有的接管人員擅自降低職工的實際工資，改變在企業中多年存在一直實行的合理的勞動獎勵制度與勞動保險制度等等，因而影響了工人工作的情緒。由于有的同志，有的地方，不善於進行接管企業的工作，也就延遲了生產的恢復，甚至使該項企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或破壞。我們需要急於改正這一類不妥當的處理或錯誤。

二

一定的革命，推翻一定的舊的生產關係，其標誌就是一定的財產所有權的轉移。封建的與半封建的土地所有權轉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的所有權轉變為人民公共的所有權，這就是現在我們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兩種財產所有權的轉移。這種財產所有權的轉移，是以政權的轉移為其前提的。我們同志以人民的代表的資格去接管官僚資本的企業，這就是官僚資本的財產轉移為人民的財產。這個接管，就是表現一種新的生產關係代替了舊的生產關係的革命。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當這個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企業落入於人民之手而變成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企業的時候，它也是由「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變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而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乃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國家經濟，按其實質說來，已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經濟，而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經濟了。列寧曾經說過：「社會主義不過是由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前進的最近一步而已。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不過是把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轉過來服務於全體人民的利益，於是也就不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了」。〔列寧論「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

所以，這裏的問題是企業歸那個階級所有，或者是歸國民黨反動派所代表的封建買辦的國家所有，而只代表四大家族及其他封建買辦官僚的利益；或者是歸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而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所有權的轉移。即完全改變了該項企業的性質。一切官僚資本企業在我們接管之後，一切在原企業中照舊盡忠職守的人們，他們亦不是為官僚資本家而工作，而是為人民而工作了。原來企業機構雖然也是照舊動作起來，但那已不是為官僚資本家的利益而動作，而是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而動作了，問題的根本性質就在這裏。我們不要打亂那和生產的進行相聯系的原來的企業機構，根本的理由，一方面，就是當官僚企業轉變為人民的企業的時候，其中絕大多數的職員，包括工程師、技師、廠長及管理人員在內，將鑒於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與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是能够在同等待遇之下照舊工作的，而毫無疑義，工人們則將熱情地工作。另一方面，這類大企業原來的技術系統與計算制度，是在一定的科學條件之下組織起來的；單從技術方面來看，這類新式大企業的技術系統與計算制度，較之我們原來在老解放區因襲機關上的供給制度及半手工業方式所草率建立起來的臨時性質的東西，是要更合於科學一些，更進步一些，因此，我們就不能夠把原來那種機關化的供給制度或半手工業以至於手工業的生產制度搬來，隨便套上這類新式的大企業。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這樣說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聞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會稱郵局為社會主義經濟底模型，這是很對的。現在的郵局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一種經濟。帝國主義正在逐漸地把所有的托拉斯變為同一形式的組織。在那些工作過重而還挨着飢荒的「普通」工人們之上，這裏存在着同樣的資產階級的官僚制。但是社會的管理的機構，這裏已經預備好了，我們只須去打倒資本家，用武裝工人的鐵手去壓服這些剝削者的反抗，去打破現代國家的官僚機關；我們就有一個沒有「寄生蟲」而是高度技術設施的機構，這個

機構可以由團結着的工人們親自來運用，同時僱用技師、監工、會計員」。

列寧指出「這是關於所有托拉斯的一個具體的、實際的，而且立即可以實現的任務」。列寧指出要「依照郵局的制度去組織我們的全部國民經濟」，而使所有的技師、監工、會計員及一切官員「要在武裝的無產階級監督和領導之下」。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明：「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因此，現在我們這裏是打倒以四大家族爲首的官僚資本家，並不是打倒一般資本家。但是，當我們打倒了官僚資本家，接管了官僚企業的機構，消滅了那裏的官僚制，實際上，也就如列寧所說的：「我們就有一個沒有寄生蟲而是高度技術設施的機構」。當我們接管了這個機構，我們首先能夠做出的是什麼呢？這就是：要使那裏所有的技師、監工、會計員以及一切官員放在以工人階級爲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和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的監督和領導之下，把所有的機器都轉動起來，而不是打亂它，更不是破壞它。在那裏，我們現在所加上的，主要是派代表加以監督，領導生產的進行，防止怠工和破壞。

再說一句：不是打亂，而是監督。——這就是我們所必須馬上學習而且能夠很快學會的工作，是比較地輕而易舉的工作。

國家代表的監督（我們目前是以軍事代表或政治代表監督），加上生產中的職工羣衆成爲主人之後的生產積極性與羣衆的監督，加上關於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教育，這樣，就能夠使我們迅速地恢復國民黨那些吸血者、那批吃人的野獸所破壞或損壞的企業，迅速地發展生產的事業。

但是，這並不是說，對於官僚資本企業不要改造、不要改革。不，不是這樣說的。要說改革的話，上面所說的廢除官僚制，正是我們對於官僚企業機構的一種革命，正是我們進行的第一步

的重大的改革。這類官僚企業機構，原來既然是與大家族及其他軍閥官僚吸血的工具，這類機構存在了很龐大的官僚系統而無情地掠奪了工人，阻止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不廢除這種吸血的官僚制，我們就不能夠推動生產力的前途。除此而外，全部企業組織，也還有很多是不合理的，對於發揚職工的積極性及發展生產是不利的，改革也是完全需要的。但是我們知道：要改革它，就必須首先了解它，熟悉它，精練它，而後才能根據一定的條件，用合理的制度去代替不合理的制度，用更高的技術組織去代替較低的技術組織。如果我們在這些方面，還沒有接觸，還沒有熟悉，還沒有掌握更高的技術與更合理的制度，就去否定和破壞原有的組織和制度，那就必然要引起混亂。只要我們對該項事業還是盲目的時候，我們的改革就無從着手；如果亂動一頓，就將是有損無益。因此，我們的改革，只能是逐步的決不能是急性的。

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在這裏，我們可以這樣說：革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火車頭。我們已經學會了本事，能夠進行這樣偉大規模的人民革命，毫無疑問；我們也將學會本事，在我們革命的基礎上，以歷史上空前的速度來提高我們的生產力，那時我們就將有比現在企業中更高得不可比擬的技術與企業組織。但是當我們還沒有達到這點的時候，我們只得從現有技術，現有企業組織的基礎上開始前進。

三

國民黨的吸血官僚們在日寇投降後搶劫人民勝利的果實，在其接收時，把日本帝國主義用中國人民血肉堆了起來的殖民地企業機構，加以四分五裂，盡量破壞，使我們今天接管這一切企業的時候，受了浩大的損失。當我們接管這許多業已被國民黨吸血官僚們打亂了，並且業已被他們

大量破壞了的企業，爲着使它們能够迅速爲人民而恢復生產，就必須謹慎處理，而不要在國民黨已打亂的基礎上再加以打亂。

國民黨官僚們分裂與洗劫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企業。是爲了貪污發財。我們有些同志在接管時候，打亂一些原來的企業機構，不是爲了貪污發財，而且時常是從革命的好心出發，他們沒有做好，僅僅是因爲不熟悉，而不是因爲別的。我們這些同志只要一旦了解了這類道理的時候，也就能够把工作做得非常之好，這已是被證明了的。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一些同志在不熟悉的情況之下，對於原來的企業制度或人事問題常常犯了草率魯莽處理的錯誤，這裏所反映的，並不是無產階級的觀點，而只是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小生產者的觀點，手工業者的觀點。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充滿了散漫性和一孔之見，處理事情起來，自己爲是，任意作主，而不是調查研究，不是虛心學習，不是按照一定歷史的規律去引導人民的事業，特別是不善於發動、組織和依靠企業中忠於革命的職工羣衆的熱情和智慧，來推動與保障人民事業的前進。這正是毛澤東同志經常嚴厲批評的主觀主義。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在組織上，也就表現爲無政府無紀律狀態，事先不請示，事後不報告。這種無政府無紀律狀態的有害於革命事業，是早由中共中央所屢次指出來的了。

很明白：關於經濟工作，我們在思想上必須繼續嚴厲地反對主觀主義，在組織上必須繼續嚴厲地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而要求所有在經濟戰線上工作的同志們百分之百地，無條件地執行中央的政策。

附 錄

一、企業管理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改革

負責制不僅是鐵路乘務上的問題，而是工業建設中帶有普遍性的原則問題，是企業管理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改革。

甚麼是負責制呢？就是要求每個職工在一定的工作崗位上，負一定生產責任，高度發揮其創造性積極性，消滅無人負責的紊亂現象，提高勞動生產率。這種制度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羣衆的自覺性，組織性與紀律性，防制少數份子的怠工，這是在企業中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重要保證之一。

負責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物，一九三一年斯大林同志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的講話（論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中，曾強調指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並規定一切工業部門都要實行這個制度，作為勞動組織的中心環節。斯大林同志說：「甚麼是無人負責的現象呢？無人負責現象就是對所担任的工作，以及對機器、機架、工具不負任何責任，在無人負責現象盛行時，當然是談不到甚麼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愛惜機器、愛惜機架、愛惜工具的。你們知道無人

負責現象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引起了什麼結果？這種無人負責現象在工業中也引起同樣的結果。我們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已消滅了無人負責現象，而提高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在工業方面也應當這樣做，以便把這方面的工作，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斯大林同志這個光輝指示，二十年來已在蘇聯工業鐵路建設上獲得了巨大成功，取得了豐富經驗，創造了新型的社會主義的生產管理制度。

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在我東北解放區鐵路乘務工作的試驗中，也同樣得到了確切的證明。林口段在三個月的輪乘制（即每輛機車不固定乘務員，輪班駕駛，也不負任何檢修責任）中，光大軸發熱一項，即損失了十萬萬元的國家財產。以後恢復乘務負責制（即每輛機車固定由三班九人或二班六人駕駛，并担負簡單的檢修責任），機車事故大大減少，發熱事故完全消滅，機車質量大大提高，乘務員說：「這一台機車是我們的好朋友，一定好好愛護它！」而在試行輪乘制的時候，乘務員們即認為：「機車是公用的，只要自己使用的這一次不發生事故就算完成任務，下次不知那年再用到它！」因此好壞不分，對機車的保護不關心的傾向大大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現在鐵路黨委已做出決定，在鐵路乘務上實行負責制，并確定負責這個方向，逐步推行到鐵路的各方面具體工作上去。東北局已經批准了這個決定，并指出要把這個制度有重點的根據具體情況推行到其它工業方面去。我們應該重視這個生產制度上極其重要的改革，首先解除思想上的阻礙，擺脫一切經驗主義的束縛。

在實行鐵路乘務負責制中，曾經有過爭論，不同意負責制的主要理由是：

一、「多少年來中國及蘇聯以外的其它各國均是採取輪乘制。」這種拘泥於舊的工作方法，并把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制度與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制度相提并論的看法，是極其有害

的非馬列主義的思想。

二、「負責制浪費人力，而輪乘制可以節省人力。」從一時表面上看似有理由，但是長遠下去，機車的損耗遠超過人力節省的價值，而且在實行負責制之後，由於機車質量及效率大大提高，段內檢點檢修人員減少，包車制所需人力會少於輪乘制。那種只從眼前和現象去看問題，而不從長遠和本質去看問題的思想方法，也顯然是非科學的。

三、「實行負責制非經過一個摸索階段不可，過去蘇聯也曾實行過輪乘制。」殊不知社會主義蘇聯已經有了二十年實行負責制的成功經驗，我們不去接受，一定要自己「摸索」造成損失，這顯然是不必要的。我們認為在工業建設中應該防止這種杜威式的實驗主義思想。

所有上述這些理由，都是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的，在工業建設中，我們的學習方向應該主要的是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我們應當很好的吸收蘇聯工業建設的基本精神和方法，根據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加以運用。蘇維埃國家經過了三十年艱苦卓絕的建設，批判地揚棄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經驗，並創造了新型的社會主義的科學技術與管理制度。勇敢地接受與學習他們的寶貴經驗，和我們自己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這是完全必要，是完全有益無害的。

我們有沒有實現負責制的可能與條件呢？

有的。在我們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營公營企業中的生產關係，基本上是和蘇聯一致的，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相反的，就是說，在我們的國營公營企業裏面，也已消滅了剝削關係，這些企業是為人民所有，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的職工是社會的主人翁地位和態度來進行生產，這就是職工自覺地擁護實現負責制的基本條件。實現這種負責制，不僅能要求每個工人完成任務，而且能發揚工人的創造性，使工人勝任愉快地使用機器，懂得機器的效能，使一般的科學知識為廣大工人所共有，因而使工人主動積極的超過任務，大大刺激生產力。而資本主義生產用盡一切方法，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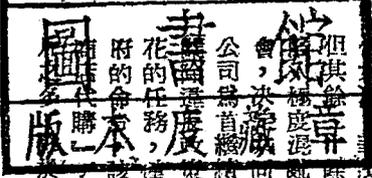
工人成爲機器的附屬品，束縛和摧殘工人的創造性，因而最多只能通過嚴密的監督壓制，使工人被迫完成規定任務；這是根本的原則的差別。

， 鐵錫黨委的決定，對我們的企業管理提供了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原則問題。我們在工業中工作的同志們，要注意克服長期農村工作所給予我們的手工業工作風，同時要防止拘泥於資本主義工業管理的經驗中的陳舊和落後部份的傾向。我們對新鮮的事物和先進的科學理論，應該有敏銳的感覺，不斷地總結經驗，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業務和技術水平，來加速我們工業建設前進的速度。

二、臨清事件經過

一九四八年十月，華北解放區臨清市（位於魯西北運河與衛河匯合處），發生華北、華東兩解放區的國營貿易機關搶購棉絨一百五十萬斤，刺激物價上漲，鼓勵私商投機，因而造成嚴重違反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事件。捲入這一漩渦中的，有駐在該市的華北解放區的國營貿易機關華茂公司，及冀中、冀南、冀魯豫、與華東的渤海、膠東等行政區的貿易機關以及其他機關開設的公營商店等共二十餘家。由於搶購，從十月九日到二十六日的十八天內，棉花價格暴漲百分之五十七，並因而引起了一般物價的暴漲。在此間，上述貿易機關共搶購了一百五十萬斤棉絨。他們除自購外，並委託私商代購，把臨清市上的存棉賣光之後，又到附近城鎮與鄉村搶購。私商們則買空賣空，攪假使潮，一齊向公家漁利。如冀魯豫區貿易機構泰興隆委託五和等兩花店代購，五和等兩花店又轉託恆滿等三花店代購，恆滿等花店又委託隆泰花店代購，這樣，使投機私商得以層層剝削國庫和小生產者。由於不顧一切的搶購，又使棉花質量大爲降低。冀魯豫貿易機關傳

署 總 版 出



豐裕從私商萬聚大花庄購入的棉花，打包時竟能壓出水來。據最低估計，每百斤棉花中若使潮十斤，則此次搶購中各貿易機關共買入水分十五萬斤，依棉價波動前之每斤二·〇三五元計算，國庫共損失冀南幣三萬萬零五百萬餘元。

此次事件的經過是：濟南解放後，華北、華東兩區物資順利流通，但華東區物價較高，棉布價格相差更大。如以十月十一日的臨清棉價為標準，則濟南較高百分之二十一，益都較高百分之五十，濰縣較高百分之八十一。加以十月中兩區貨幣等價流通，勢必更引起華東區商人雲集臨清大量採購棉花的現象。但是兩區的國營貿易機關，在這個時候不但沒有採取調劑兩區物資，穩定物價的必要辦法，而且也隨私商之後互相爭購，各自為政，無計劃無領導地大量吸收，便使棉價大漲。該公司看見棉價如此大漲，便停止收買，企圖以自己不收買的「姿態」來穩定物價，但家國營商店及機關商店，則正紛紛搶購，於是物價繼續上漲，私商繼續舞弊，市場極度混亂。該地工商局及國營華茂公司見此情形，便於十月十四日召集全市公營貿易機關開會，決議向停止收購（這個決議也不正確，是讓出陣地讓私商自由投機），但第二天又以華茂公司為首繼續搶購，終至造成上述的棉價及一般物價暴漲和質量降低現象。在此期間，各貿易機關外，無政府無紀律現象也很嚴重，如冀魯豫之泰興隆，並未得該行政區政府購買棉花的任務，竟為了運往濟南賺錢而私自買了十七、八萬斤。這些公司會於十月二十日獲得華北政府的命令，該命令規定「各區公營商店，不許在臨清市直接購買棉花，如有需要，可由當地國營機關代購」，但仍無法設計繼續收購，如冀南建華一分公司就於得悉此一命令後購入棉花五十萬斤，造成了市場上的上述險惡現象。

論
工
商
業
政
策

黨一
之輯選
政策
中國

編者
中央
中共
中原局
宣傳部

出版者
新
華
書
店

一九四九年五月
出版

中原版(豫)00001—10000冊

1949
5
機 0118

C

9.296